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作者：胡小勇，郭永玉，李静，杨沈龙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中国梦”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政治话语，并非社会心理学的学术概念，与研究问题的逻辑关系不明显；具体表述也存在含糊或不准确的地方，如其中的“民族的梦”并不是本研究的考察对象，“中国梦”也不确定指的是社会公平，还是教育、就业目标，“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与研究中国社会公平对高阶层群体无显著效应的结果相矛盾；“梦想即目标”在逻辑上跳跃过快。建议在前言中删除有关“中国梦”的描述，而在讨论中可以适当提及。

回应：已遵照该意见对有关“中国梦”内容进行了修改。

意见 2：社会公平（social fairness）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但本文所引用的社会心理学文献（Hafe, 2000; Hafer, Bègue, Choma, & Dempsey, 2005; Laurin, Fitzsimons & Kay, 2011）主要讨论的是 anti-social 的 just-world belief（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人们各得其所、活该如此）和 system justification（社会体制公平美好，无需做大的改革）。诸多研究发现，后者常常导致受害者贬损、不公合理化等反社会态度，与社会公平的治理目标相悖（Furnham, 2003）；近期研究发现这些 anti-social 的东西是把双刃剑，即具有重要的心理功能，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有 palliative function (Jost & Hunyady, 2002)。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 palliative function 属于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和补偿合理化（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Gaucher et al., 2010），是基于正义动机（justice motive）这一根本性的幻觉（Fundamental control）（Lerner, 1980），所以这些研究才得以发表在 JPSP 等顶级期刊上。这一基本理论预设，与 Rawls (1958)关于 social fairness 的分析是一致的，即相信这个社会 undeserved 或存在不公才是 pro-social 的态度，而相信这个社会 deserved 或已然公正合理是 anti-social 的态度。涉及像 social justice & social fairness 这些基础概念的实证研究，很难绕开社会心理学六十多年的研究积累和基础理论表达。由此，可以说本文在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存在文献理解和引用失误。

回应：审稿专家对社会公平公正领域的理论与研究有非常深刻的见解，本文作者们也非常赞成专家的看法。原稿中引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关于“公正世界信念”文献（Hafe, 2000; Hafer, Bègue, Choma, & Dempsey, 2005; Laurin, Fitzsimons & Kay, 2011）主要意图是想表明，目标追求领域的研究可以扩展到社会公平公正这一宏观的领域中，但是在引用文献时，为了避免过多的概念，也为了避免过多篇幅澄清一个概念和另一个概念之间关系，在翻译时，把社会公平领域中相关文献都统一翻译为“社会公平”。这样一来，虽然达到了简化、清晰这一目的，但是出现了专家所说的“理论问题上存在文献理

解和引用失误”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在修改稿中进行了如下修改（见 2.1 的第二与第三自然段）：

（1）对社会公平感与公正世界信念概念进一步澄清。社会公平（social justice）是一种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收益和成本是通过一定的分配规则来进行的；具有政治管理性的程序、标准、规则以及其它决策都应保护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们不仅受到当局，而且受到其他一切社会人员，包括一切公民的有尊严地对待（Jost & Kay, 2010）。该定义三个方面大体上对应着分配公平（Adams, 1965）、程序公平（Thibaut & Walker, 1975）和互动公平（Bies & Moag, 1986; Colquitt, 2001）。社会公平感（perceived social justice）就是人们对上述社会公平理念达成程度的感受（杨音宜，王俊秀, 2011）。社会公平与否是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的（Jost & Kay, 2010）。

公正世界信念指的是人们有一种基本的需要，即相信所处的世界是公正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Lerner, 1965, 1980）。这其中蕴含了一种推理，无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与自身行为或品行有着某种因果关系，是得其所应得。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提供有意义的解释框架和策略帮助人们应对不公正事件的威胁，在现实或是认知的层面上重建公正感，降低感知到的不公正感，这是其基本功能，也是早期研究关注的重点。其次，作为一种个人资源或者心理缓冲，减少不公正事件的消极影响，维护心理健康，并促进个体对长远目标的追求。同时，虽然认知感知重建可能导致对不公正受害者的消极态度，但是如果从观察者的角度，之所以进行认知合理化的目的还是在于缓冲不公正的影响；只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对受害者不是帮助和补偿，而是贬损责怪，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有悖社会道德，也不利于社会和谐，因此从社会层面来看，其影响是消极的。总之，公正世界信念属于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和补偿合理化（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 Gaucher et al., 2010），是基于正义动机（justice motive）这一根本性的幻觉（fundamental control, Lerner, 1980），并不能反映社会公平与否（Furnham, 2003; Gaucher et al., 2010; Lerner, 1980）。而最能直接体现社会公平程度的指标是社会公平感（Jost & Kay, 2010）。

（2）根据审稿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阐述了公正世界信念的文献在本文研究问题提出的作用。公正世界信念的文献，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背景线索，表明目标追求的领域可以同公平领域的研究关联起来。我们在修改稿第一篇中的“2.1 第三自然段”，修改/补充了这部分内容。修改后的内容为“依据行动阶段模型（Gollwitzer, 1990）可知，在目标设定阶段，公平的社会环境显著影响了目标的可得性，公平环境中个体实现目标的机会更大。因此，当个体感知到社会是公平的时候，其目标承诺水平更高。然而，对于这一理论假设，直到最近 Laurin 等人（2011）才给出间接实证证据。Laurin 等人（2011）让实验组被试阅读一篇关于社会公平的短文（描述加拿大社会越来越公平）；控制组被试阅读一篇与社会公平无关的短文（描述珍稀动物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然后，所有被试完成未来职业目标投入时间和资源的意愿的测量问卷。结果表明，相对于控制组来说，公平启动组被试的追求长期职业目标动机水平更高。随后，采用内隐的启动方法来考察公正世界信念与目标承诺之间关系结果也表明，相对于内隐不公平启动组被试来说，内隐公平启动组报告了更多的目标投入意愿。最后，使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包含了 49 个国家 53394 个被试的样本验证了前面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见，当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需要越高时，其目标承诺水平也就越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公正世界信念这一适应性功能属于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和补偿合理化（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 Gaucher et al., 2010），是基于正义动机（justice motive）这一根本性的幻觉（fundamental control, Lerner, 1980），并不能反映社会公平与否（Furnham, 2003; Gaucher et al., 2010; Lerner, 1980）。而最能直接体现社会公平

程度的指标是社会公平感（Jost & Kay, 2010）。基于上述文献分析，本研究中假设社会公平感能显著正向影响目标承诺。”

参考文献：

- Adams, 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267-299.
- Bies, R. J., & Moag, J. S. (1986).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1(1), 43-55.
- Colquitt, J. A. (2001). On the dimensionalit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3), 386-400.
- Furnham, A. (200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5), 795-817.
- Gaucher, D., Hafer, C. L., Kay, A. C., & Davidenko, N. (2010). 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everyday undeserved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 109-118.
- Hafer, C. L. (2000). Do innocent victims threaten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vidence from a modified Stroop ta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2), 165-173.
- Hafer, C. L., Bègue, L., Choma, B. L., & Dempsey, J. L. (2005).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commitment to long-term deserved outcom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8(4), 429-444.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T.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ition, Vol. 2, pp. 1122-1165).
- Laurin, K., Fitzsimons, G. M., & Kay, A. C. (2011). Social disadvantage and the self-regulatory function of justice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1), 149-172.
- Lerner, M.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Plenum Press New York.
- Thibaut, J. W., & Walker, 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L.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意见 3： 本文研究 1、4、7 中的一般社会公平（包含权利公平、制度公平、弱势公平、互动公平、分配公平），而研究 2、3、5、6、8、9 主要涉及特殊领域的教育公平与就业公平。前后逻辑关系及概念的同质性需要更多介绍。从与后续研究逻辑一致性上看，或许一般社会公平中的制度公平、弱势公平跟教育/就业公平更一致。更重要的是，从概念定义上看，五个维度的划分缺乏理论依据——关于社会公平已有大量成型的构念，如公平、不公，程序、分配，行动者、接受者，自我-他人，当下、终极；张媛（2009）自编量表中的 5 个维度是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从而数据驱动的结构划分吗？

回应： 谢谢专家的建议。（1）前后逻辑关系及概念的同质性需要更多介绍。从与后续研究逻辑一致性上看，或许一般社会公平中的制度公平、弱势公平跟教育/就业公平更一致。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的相应部分进行了修改。例如，在“3.2 研究 2”部分的第 1 自然段增加了以下表述“可见，本研究将研究 1 中的一般的社会公平感具体到了特殊的就业领域中的公平感，反映的是一般社会公平感中的制度公平、弱势公平”；在“3.3 研究 3”部分第 1 自然段增加了以下表述“可见，本研究将研究 1 中的一般社会公平感具体到了分配公平领域”。

（2）张媛（2009）自编量表中的 5 个维度是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从而数据驱动的结构划分吗？从张媛（2009）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可知，5 个维度是建立在理论与数据相结合基础上得出的。具体研究步骤是：第一阶段：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得出社会公平感维度的理论假设。第二阶段：从实际出发，通过收集词汇和词语评级，用统计软件自下而上地分析出社会公平感的探索结构，结合之前的理论假设，确立社会公平感的心理结构。第三阶段：以第二阶段得出的社会公平感结构为依据，参考组织公平感结构问卷等相关问卷，编制中国青少年社会公平感心理结构的预测问卷，并进行预测“通过项目评估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筛选和删减项目；最后，确定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正式问卷。第四阶段：对问卷进行正式施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之前假设的因素结构，并对受测群体的社会公平感进行描述，探讨青少年社会公平感受在某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以及一般生活满意感与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关系。

张媛(2009)的理论依据包括 1965 年 Adams 的分配公平、1975 年,Thibaut 和 Walker 的程序公平、1986 年,Bies 和 Moag 的互动公平及中国古代社会公平思想以及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理论。虽然国内外研究者基本在三因素论或四因素论上达到了共识(Greenberg,1990),认为组织公平感的结构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人际公平、信息公平);而本研究确得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以及结果公平的原因是,从国外的社会公平的理论看来,权利和财物的分配是他们主要探讨的内容,西方的自由主义风格重视人的独特性,强调分配程序的公正性,无论是财物的占有或转让,还是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群体拟定相应的分配程序。某些理论中的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原则,其主要目的只是弥补之前正义原则的缺憾。对于中国的社会公平理论,一系列公正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着眼更加宏观,对于个体利益的关注度较少,且中国的公平理论比较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它不是某种缺憾的弥补,而是一个需要被正视的问题。根据对组织公平感理论的回顾,我们得知在组织领域中,公平感的结构有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信息公平和人际公平)这几个维度。而通过对社会公平理论的整理,我们发现,在现代中国,一个公平社会的/应有社会状况中包含有权利、自由竞争和结果分配的问题,其中,自由竞争还包含机会和竞争程序的问题,结果公平也包含对社会整体状况的考量,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问题。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以及结果公平,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判断社会公平与否的主要线索。通过对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结果的整合,张媛(2009)认为,在现代的中国,人们社会公平感的结构应包含 5 个维度,它们分别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以及结果公平。

参考文献:

Zhang, Y. (2009).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Master's degree thesis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张媛. (2009). *中国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结构与测量*.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意见 4: 文中多次提及“中国文化”,但并没有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也没有充分引用已经发表的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研究文献。其实,与本文所引用文献中 justice belief 概念一致、并使用中国被试的研究已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部分文献考察和检验了 justice 在中国文化下的理论意义和心理机制(Bai, Liu, & Kou, 2014; Poon & Chen, 2014; Xie, Liu, & Gan, 2011; Wu, Sutton, et al., 2013; Wu, Yan, et al., 2011),但作者均未引用。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提供的文献线索。通过阅读这些文献,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在公正世界信念领域研究中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探讨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的适应性功能及其机制。例如, Wu 和 Sutton 等(2013)直接考察的是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的适应性功能以及未来时间定向对其调节作用。Wu 和 Yan 等(2011)探讨了来自于集体文化的中国被试的一般公正世界信念与心理弹性之间关系,发现一般性公正世界信念显著正向预测了心理弹性。Xie, Liu 和 Gan(2011)则考察的是 5.12 汶川地震之后,公正世界信念对维持震后个体心理健康作用,以及确定感和未来定向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也有研究者考察了公正世界信念对腐败意图以及在遭受到排斥后的攻击行为的影响(Bai, Liu, & Kou, 2014; Poon & Chen, 2014)。

然而,本文所要探讨的是社会公平感,与公正世界信念有着本质区别。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认为,人们有一种基本的需要,即相信所处的世界是公正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Lerner, 1965, 1980)。这其中蕴含了一种推理,无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与自身行为或品行有着某种因果关系,是得其所应得。这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善恶有报”的思想，好的结果总是发生在好人身上，而坏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因此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对于各种受害者的冷漠、拒绝甚至是歧视的现象。为什么公正世界信念对于人们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惜扭曲客观事实以达到得其所应得的推论？公正世界信念理论认为，这种信念使人们相信所处的世界是稳定有序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自己会被公正地对待，不会成为不可预见的灾难的受害者。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可控制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追求长远目标，并相信自己最终会得其所应得(Lerner, 1980)。

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提供有意义的解释框架和策略帮助人们应对不公正事件的威胁，在现实或是认知的层面上重建公正感，降低感知到的不公正感，这是其基本功能，也是早期研究关注的重点。其次，作为一种个人资源或者心理缓冲，减少不公正事件的消极影响，维护心理健康，并促进个体对长远目标的追求。其中，关于公正世界信念对心理健康维护功能的研究较多，而关于促进长远目标追求的功能研究还比较少。以往有研究将其应对威胁、重建公正的功能看做是一种消极的影响，可能导致对受害者的消极态度，但实际上，重建公正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对受害者进行贬损和责怪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同时，虽然认知感知重建可能导致对不公正受害者的消极态度，但是如果从观察者的角度，之所以进行认知合理化的目的还是在于缓冲不公正的影响，因此从观察者的角度，其心理影响仍然是积极的，只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对受害者不是帮助和补偿，而是贬损责怪，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有悖社会道德，也不利于社会和谐，因此从社会层面来看，其影响是消极的。

总之，公正世界信念属于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和补偿合理化（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 Gaucher et al., 2010），是基于正义动机（justice motive）这一根本性的幻觉（fundamental control, Lerner, 1980），并不能反映社会公平与否（Furnham, 2003; Gaucher et al., 2010; Lerner, 1980）。而最能直接体现社会公平程度的指标是社会公平感（Jost & Kay, 2010）。社会公平（social justice）是一种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收益和成本是通过一定的分配规则来进行的；具有政治管理性的程序、标准、规则以及其它决策都应保护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们不仅受到当局，而且受到其他一切社会人员，包括一切公民的有尊严地对待（Jost & Kay, 2010）。该定义三个方面大体上对应着分配公平（Adams, 1965）、程序公平（Thibaut & Walker, 1975）和互动公平（Bies & Moag, 1986; Colquitt, 2001）。社会公平感（perceived social justice）就是人们对上述社会公平理念达成程度的感受（杨音宜，王俊秀，2011）。社会公平与否是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的（Jost & Kay, 2010）。

通过对以上文献分析，本文研究者们认为公正世界信念与社会公平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会在后续的研究中再深入考察公正世界信念相关功能。

关于中国文化，在原稿与修改稿中均有适当阐述，因文化因素的复杂性以及该领域研究的现状，本研究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征的是尽可能随机地选取中国被试，使用本土化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材料，以此来发中国文化背景下，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追求的影响。

参考文献：

- Adams, 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267-299.
- Bai, B. Y., Liu, X. X., & Kou, Y. (2014). Belief in a just world lowers perceived intention of corrup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punishment. *PloS one*, 9(5), e97075.
- Bies, R. J., & Moag, J. S. (1986).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1(1), 43-55.
- Colquitt, J. A. (2001). On the dimensionalit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3), 386-400.

- Gaucher, D., Hafer, C. L., Kay, A. C., & Davidenko, N. (2010). 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everyday undeserved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 109-118.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T.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ition, Vol. 2, pp. 1122-1165).
- Lerner, M.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Plenum Press New York.
- Poon, K. T., & Chen, Z. (2014). When justice surrenders: The effect of just-world beliefs on aggression following ostrac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2, 101-112.
- Thibaut, J. W., & Walker, 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L.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 Wu, M. S., Sutton, R. M., Yan, X., Zhou, C., Chen, Y., Zhu, Z., & Han, B. (2013). Time frame and justice motive: Future perspective moderates the adaptive function of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loS one*, 8(11), e80668.
- Wu, M. S., Yan, X., Zhou, C., Chen, Y., Li, J., Zhu, Z., ... & Han, B. (2011).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silience: Evidence from a collectivistic cul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5(6), 431-442.
- Xie, X., Liu, H., & Gan, Y. (2011).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hen encountering the 5/12 Wenchuan earthquak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3(4), 566-586.
- Yang, Y. Y., Wang, J. X. (2013). *Research on Social Ment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杨宜音, 王俊秀. (2013). *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意见 5: 文章讨论了本研究在方法上的局限, 但更重要的局限或许是, 本文所实测的“社会公平”是主观的社会公平知觉, 并非客观的社会公平、也非前人研究中的 justice belief。由此: 1) 概念使用需更精确表达(如标题及正文中的“社会公平”); 2) 社会公平知觉仍然属于 illusionary control 或 secondary control, 它在短期的学业、就业目标上尚且有效, 一旦置身于社会“惨淡的现实”, 这些低阶层者在“梦醒时分”是否会表现出更大的挫败感、以致陷入愤怒或沉沦。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理论将 justice belief 当做双刃剑(anti-social attitudes 和心理镇痛剂)的原因, 这或许也是社会公平知觉为何在高阶层个体身上作用不明显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那是 Illusion, “梦想”需要依靠其他更重要的心理和社会资源。相反, 低阶层个体的社会公平其实恰好反映了他们的脆弱性, 作者在文中介绍社会阶层理论时也做了引用, 如“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 低阶层者追求的目标受到了他们的较少的经济资源和较低社会地位的限制。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下, 使得低社会阶层者形成了一种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社会认知倾向, 即情境定向, 倾向于认为心理和行为受情境因素的影响”。可惜这一重要的理论环节没有在研究设计及讨论中得以展开。

回应: 谢谢专家的建议。

(1) 概念的表达上, 修改后标题和正文中的社会公平都统一精确地表达为“社会公平感”。

(2) 社会阶层心理学理论“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 低阶层者追求的目标受到了他们的较少的经济资源和较低社会地位的限制。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下, 使得低社会阶层者形成了一种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社会认知倾向, 即情境定向, 倾向于认为心理和行为受情境因素的影响”等理论观点, 在研究设计及讨论中得以展开。例如: 虽然公平显著正向影响了目标达成, 但是对高低不同阶层者来说, 并不都是一样的。正如社会阶层心理学理论(Kraus et al., 2012)所指出的那样, 高社会阶层者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 并感知到较高的社会地位, 因此能自由地追求他们自己设定的目标(Johnson & Krueger, 2005; Lachman & Weaver, 1998)。相反, 形成了情境主义定向的低阶层者, 其目标追求更多受到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低社会阶层者的社会情境的主要内容是缺少物质资源、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 低阶层者追求的目标受到了他们的较少的经济资源和较低社会地位的限制。由于长期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 个体在目标追求过程中, 更容易受到社会不公的影响。通过相关研究、准实验研究和实验研究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考察公平对高低阶层者目标追求动机的差异, 发现在公平的情境下, 低阶层者目标追求的动机水平(目标承诺分数)要显著高于

不公平情境下的得分；而对于高阶层者来说，其目标追求动机水平则不受社会公平的影响。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被试群体、不同的目标情境都得出较一致的结论，表明该结论不仅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而且具有较好的外部效度（Shadish, Cook, & Campbell, 2002）。这是本研究对社会阶层心理学（Kraus, Piff, & Keltner, 2011）的一个贡献，为其理论假设提供了的实证支持。

（3）在讨论部分（见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部分），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追求动机和目标达成影响的结论的实际应用价值的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所考察的目标是短期和中期目标的达成动机与达成情况，在对这样一些目标的追求过程中，本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能起到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而对于长期的目标，或者说值得一生追求的“梦想”的实现，或许需要依靠其他更重要的心理和社会资源，而社会公平感在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需要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展开”。

参考文献：

- Johnson, W., & Krueger, R. F. (2005). Higher perceived life control decreases genetic variance in physical health: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twin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1), 165-173.
- Lachman, M. E., & Weaver, S. L. (1998). The sense of control as a moderator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3), 763-773.
- Shadish, W. R., Cook, T. D., & Campbell, D. T. (2002).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Generalized Causal Inferenc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Review]. *Psychol Rev*, 119(3), 546-572.

意见 6：关于社会公平感及 justice belief 已有大量工具及中文修订版（见：王俊秀、杨宜音（编）. 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 第 7、11 章），但作者并未说明，而直接使用张媛（2009）未发表的自编量表，且 5 个维度（权利公平、制度公平、弱势公平、互动公平、分配公平）在结构上让人很费解，或者让人感觉其更像是因子分析的数据驱动结果。

回应：谢谢专家的建议。张媛（2009）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可知，5 个维度是建立在理论与数据相结合基础上得出的。具体研究步骤是：第一阶段：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得出社会公平感维度的理论假设。第二阶段：从实际出发,通过收集词汇和词语评级，用统计软件自下而上地分析出社会公平感的探索结构，结合之前的理论假设，确立社会公平感的心理结构。第三阶段：以第二阶段得出的社会公平感结构为依据，参考组织公平感结构问卷等相关问卷，编制中国青少年社会公平感心理结构的预测问卷，并进行预测"通过项目评估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筛选和删减项目；最后，确定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正式问卷。第四阶段：对问卷进行正式施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之前假设的因素结构，并对受测群体的社会公平感进行描述，探讨青少年社会公平感受在某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以及一般生活满意感与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关系。青少年社会公平感问卷的各项指标较好，是可以接受的。量表的具体指标如下：

信度：研究检验了各个项目的题总相关；总体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和分半信度；各维度的相关情况以及同质性信度等多项信度指标；结果显示，所有项目与总分的相关都达到了 0.40 以上，并在 0.01 水平上显著；总体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51；分半信度为 0.892，是非常好的信度指标；各个维度的相关均在 0.50 以上，并在 0.01 水平上显著，且各维度的 Q 系数在 0.730-0.890 之间。总的来说，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效度：通过研究 1 的词汇评价，因素分析抽取出了 6 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63.82%；研究 2 中采用项目编制的方法，获得了 5 因素结构，能够解释总变量的 61.29%，且该结构得到了验证性因素分

析的验证, χ^2/df 小于 3, RMSEA 值小于 0.05, 各项拟合指数都在 0.90 左右, 根据模型衡量的标准, 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 5 因素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和度, 因此, 说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国外研究者基本在三因素论或四因素论上达到了共识 (Greenberg, 1990), 认为组织公平感的结构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 (人际公平、信息公平); 而张媛 (2009) 确得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以及结果公平的原因是, 从国外的社会公平的理论看来, 权利和财物的分配是他们主要探讨的内容, 西方的自由主义风格重视人的独特性, 强调分配程序的公正性, 无论是财物的占有或转让, 还是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群体拟定相应的分配程序。某些理论中的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原则, 其主要目的只是弥补之前正义原则的缺憾。对于中国的社会公平理论, 一系列公正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着眼更加宏观, 对于个体利益的关注度较少, 且中国的公平理论比较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扶助, 它不是某种缺憾的弥补, 而是一个需要被正视的问题。根据对组织公平感理论的回顾, 我们得知在组织领域中, 公平感的结构有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 (信息公平和人际公平) 这几个维度。而通过对社会公平理论的整理, 我们发现, 在现代中国, 一个公平社会的/应有社会状况中包含有权利、自由竞争和结果分配的问题, 其中, 自由竞争还包含机会和竞争程序的问题, 结果公平也包含对社会整体状况的考量, 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问题。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以及结果公平, 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中, 人们判断社会公平与否的主要线索。通过对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结果的整合, 我们认为, 在现代的中国, 人们社会公平感的结构应包含 5 个维度, 它们分别是: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以及结果公平。

王俊秀、杨宜音 (2013) 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中“社会公平感及其测量”一文简要介绍了关于社会公平感的测量方法, 包括问卷法 (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 和实验法 (博弈实验、漏桶实验、案例实验)。而我们研究中所采用方法属于问卷法中的间接测量, 在王俊秀、杨宜音 (2013) 一书中介绍的是感知到的绩效评价公平和普情境的程序公平。鉴于以上原因, 本研究选用张媛 (2009) 编制的社会公平感问卷作为本研究工具。

参考文献:

Zhang, Y. (2009).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Master's degree thesis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张媛. (2009). *中国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结构与测量*.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意见 7: 交互作用除了在中文中报告统计指标外, 用图或许比用表格更直观。

回应: 已遵照意见修改。

意见 8: Brosnan & De Waal (2003) 研究中使用黄瓜、葡萄来操纵猴子的公平感, 是因为已有大量证据表明猴子对黄瓜、葡萄的喜好差异, 但在理论和经验上我们有理由怀疑人类被试对 1 元、5 元的喜好差异不足以有黄瓜、葡萄的差异那么大, 或者在人民币不断贬值的今天中国被试真的在意两个小钱 (1 元、5 元) 的差别吗? 把动物实验的方法迁移到人类被试身上, 不妨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但其逻辑关系、理论依据还需详细说明。此外, manipulation check 使用何种工具来测量公平感受?

回应: 我们参考了 Messé L. A. 和 Watts, B. L. 于 1983 年发表在 JPSP 上的文章, 他们就是通过分配报酬的多少来操纵公平感来考察社会比较对公平感产生的影响作用。在该研究中, 被试要完成连续 5 个阶段的任务, 每一个阶段持续时间为 25 分钟, 每一个阶段结束后都会获得一定报酬 (一部分被试是 0.5

美元，另一部分被试是 1.75 美元），研究结果表明，当被试的所得报酬很低时，社会比较确实显著影响了公平感。因此，本研究设计使用 1 元、5 元的报酬差异来操纵公平感。

起初，在引用文献过程中，为了使用较新的，且更加权威一些的文獻，就引用了 Brosnan & De Waal (2003) 发表在 *Nature* 上的文獻。该文獻中，研究者使用黄瓜、葡萄来操纵猴子的公平感，虽然把动物实验的方法迁移到人类被试身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其内在逻辑关系和理论依据还不充分。为了避免这种不足，在修改稿中直接引用了 Lawrence 和 Barbara (1983) 的研究。

本研究 manipulation check 使用 Lawrence 和 Barbara (1983) 在研究中使用的工具来测量公平感受。由一道题构成，“与他人相比，您所得报酬的公平程度”，被试在 7 点量表上完成。

1 元和 5 元之间的差异是不是足够大到引起不公平感。这个一方面可以用文獻来证明，另一方面，也可以用的研究数据来证明。

实验操纵对高底阶层目标承诺影响研究。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首先需要检验自变量公平的操纵是否有效。且对高、低阶层者公平操纵有效性分别进行分析。首先，在高阶层中，少得不公组被试 16 人，公平感受得分 3.13 (SD=2.00)；公平组 17 人，公平感受得分 6.00 (SD=1.23)；多得的不公组 15 人，公平感受 3.80 分 (SD=1.70)。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公平启动组与不公平启动组在公平感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F_{(2, 45)} = 13.56, p < 0.001$ ；表明少的不公、多得的不公和公平组被试的公平感受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接着采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少得不公与多得的不公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MD = -0.68$)， $SE = 0.60, p > 0.05$ ；少得不公与公平组在公平感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 ($MD = -2.88$)， $SE = 0.58, p < 0.001$ ；多得的不公与公平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MD = -2.20$)， $SE = 0.59, p < 0.001$ 。

在低阶层中，少得不公组被试 20 人，公平感受得分 2.40 (SD=1.429)；公平组被试 21 人，公平感受得分 5.14 (SD=2.104)、多得公平组分别是 18 人，公平感受得分 3.06 (SD=1.626)。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公平启动组与不公启动组在公平感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F_{(2, 56)} = 13.66, p < 0.001$ 。表明少的不公、多得的不公和公平组被试的公平感受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接着，采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少得不公与多得的不公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MD = -0.66$)， $SE = 0.57, p > 0.05$ ；少得不公与公平组在公平感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 ($MD = -2.74$)， $SE = 0.55, p < 0.001$ ；多得的不公与公平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MD = -2.09$)， $SE = 0.56, p < 0.001$ ，此结果表明，公平操纵对于高、低阶层者均是有效的。

参考文献：

- Messé, L. A., & Watts, B. L. (1983). Complex nature of the sense of fairness: Internal standards and social comparison as bases for reward eval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1), 84-93.
- Brosnan, S. F., & De Waal, F. B. (2003). Monkeys reject unequal pay. *Nature*, 425(6955), 297-299.

意见 9： 作者同时报告了三个大研究、9 个小研究，这在形式上很像是一篇压缩版的学位论文或项目报告。但作为期刊论文，即便篇幅很长，也很难做到每一个研究都有充分的理论展开；三个研究系统检验了社会公平知觉-目标承诺的阶层效应、社会公平知觉-目标承诺与目标达成的阶层效应、社会公平知觉-目标承诺的阶层效应与自我调节效应，即存在从现象到机制、从理论到实践操作的递进关系，但方法优势只有在充分理论基础之上才能得以体现。例如，研究二的目标达成应仅限于教育领域，或者短期的学业功利目标达成；但如果社会公平知觉仅仅是幻觉和短暂的，研究三的自我调节有何意义？鸦片等致幻剂确有镇痛作用，但开处方是否要慎之又慎？退一步讲，与其同时报告三个大的研究，可否考虑分别写三篇精致的论文？

回应： 谢谢专家的建议。已遵照该建议对文章进行了修改。

审稿人2意见:

意见 1: 行文结构不符合《心理学报》要求, 本文写作不是期刊学术论文的写法, 请参阅《心理学报》发表的文章。

回应: 谢谢专家的建议。已遵照该建议进行了修改。将原稿拆分为三篇文章, 并对照学报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修改。

意见 2: 研究的逻辑不清晰, 问题提出依据不充分, 研究缺乏生态效度。作者言“调查数据表明, 对于大多数低阶层者来说, 他们的重要人生目标通常是很难实现的。那么, 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低阶层者的目标达成? 如何促进其有效地追求目标?” 不过, 低阶层和高阶层者重要人生目标是什么? 他们的目标一样吗? 作者探讨有效追求目标, 却未讨论合理制定目标, 而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作者从“中国梦”引出问题, 讨论影响低阶层和高阶层者重要人生目标的影响因素, 落脚点却是“在 15 分钟内完成 10 道图形逻辑推理题目。”和“每天辅导孩子做作业十五分钟”的目标设定, 此目标非彼目标。研究缺乏生态效度。虽然作者发现社会公平和目标承诺的相关, 但这种相关仅是统计学意义的, 不具有现实意义, 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公平和“在 15 分钟内完成 10 道图形逻辑推理题目”或“每天辅导孩子做作业十五分钟”有内在逻辑联系, 且“在 15 分钟内完成 10 道图形逻辑推理题目”的目标承诺意义何在? 这种目标设定与不同阶层者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回应: (1) 对“低阶层和高阶层者重要人生目标是什么, 他们的目标一样吗?” 的回应。无论高阶层者和低阶层者, 都需要接受教育, 都需要工作, 因此无论对于哪个阶层来说, 教育和工作都是其重要人生目标。也许他们的目标动机存在差异, 但接受好的教育、找个好工作这些重要人生目标应是一样的。从我们对低阶层者的调查结果中可见一斑。那么广大的低阶层者的目标追求有哪些? 以低阶层学生为对象, 进行的调查发现: 204 名农村中学生中 80.90% 的人认为他们当前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是考个好大学; 103 名农村大学生中 74.76% 的人认为他们当前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是找个好工作。

(2) 作者探讨有效追求目标, 却未讨论合理制定目标, 而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关于目标追求, 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Little (1999) 指出个人目标的实现要经历构想、计划、行动和结束这些主要的阶段。Sheldon 等 (2004) 提出了目标奋斗与需求满足的自我和谐模型 (Self-Concordance Model), 明确指出目标追求是由自我和谐目标的设定、持续投入和目标实现三个阶段构成。而得到广泛而深入研究的是 Gollwitzer (1990) 所提出的行动阶段模型 (the model of action phase)。本文所探讨的目标追求就是建立在行动阶段模型的基础上的。

依据行动阶段模型 (Gollwitzer, 1990; Heckhausen & Gollwitzer, 1987) 可知, 设定一个目标是目标追求的第一个阶段所需要完成的任务。

具体来说, 行动阶段模型 (Gollwitzer, 1990; Heckhausen & Gollwitzer, 1987) 认为, 目标追求过程可由四个不同的但又连贯的阶段构成。在每一个阶段, 人们都面临一个在质上有区别的任务, 每一阶段任务的完成, 才能导致目标的实现。行动阶段模型提出的目标追求的四个阶段是: 前决策阶段、前行动阶段、行动阶段和后行动阶段。第一是前决策阶段, 个体依据可得性 (accessibility) 以及渴望性 (desirability) 的评价标准对各种欲求 (wish/desire) 进行评价, 以决定是否将某个欲求确定为目标,

即形成目标意向 (goal intention), 做出目标承诺。第二是前行动阶段, 个体针对目标来制定一个关于时间、地点以及如何来执行行动的计划, 即形成执行意向。当一个目标定向的行为常常得以实施或者说本就是一件日常的事情, 该目标定向行为的发动和执行就相当容易; 而当个体还没有决定时间、地点以及如何行动时, 目标定向行为的发动与执行就相当困难。在困难的情况下, 执行目标定向行为是需要进行精心准备的, 在将愿望转变成行动的过程中, 个体需要通过反思以及判断来制定一个关于时间、地点以及如何来执行行动的计划, 即执行意向。该阶段任务的完成将使个体发动并成功地执行一个目标定向的行为。第三是行动阶段, 该阶段目标定向行为将导致预期的结果; 为了这一目的, 个体必须迅速地对情境中的机会或需求做出反应, 必须抓住所有的能使目标进步的机会, 而且当遇到困难和障碍时, 能迅速增加其努力程度。对情境中的机会与需求迅速地进行反应提升了目标达成。第四是后行动阶段, 个体通过比较达成的结果与自己原本的期望来评价目标成就。而其中形成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 即设定和执行目标是实现目标的重要的前提条件。建立在行动阶段模型的基础上, 大量实证研究证据 (Armor & Taylor, 2003; Bargh, Gollwitzer, & Oettingen, 2010; Brandstätter & Frank, 2002; Fujita et al., 2007) 表明, 设定一个高承诺水平的目标以及通过自我调节有效地执行目标是影响目标达成的关键因素。即成功的目标追求依赖于对两个连续的任务的解决: 设定目标与执行目标。

此外, 大量证据表明, 设定一个高承诺水平的目标只能解释行为25%-30%的变异 (Gollwitzer, 1999; Sheeran, 2002)。依据Webb和Sheeran (2006) 可知, 一个中等偏上水平的目标承诺水平的改变 ($d = .66$) 只能带来一个中等偏下的行为改变 ($d = .36$), 因此目标承诺水平的改变, 并不能同样程度地导致行为改变与目标实现。也就是说, 环境因素 (社会公平) 能显著地影响目标追求动机, 且效应量很大, 但是目标追求动机对目标达成的影响的效应量却较小。那么, 哪些因素更有利于目标达成? 建立在大量实证研究证据基础上, 目标追求自我调节理论 (Gollwitzer, 1999) 认为, 虽然在设定目标阶段设定一个动机水平较高的目标有利于目标达成, 但是在执行阶段, 有效自我调节更有利于目标达成。一个包括8000名被试, 且涵盖了实验室认知目标以及真实生活中健康、教育、环境等领域目标的元分析结果表明, 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影响的效应值为 $d = .65$ (Gollwitzer & Sheeran, 2006)。依据Cohen (1992) 的标准, 这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效应值。

(3) 作者从“中国梦”引出问题, 讨论影响低阶层和高阶层者重要人生目标的影响因素, 落脚点却是“在 15 分钟内完成 10 道图形逻辑推理题目。”和“每天辅导孩子做作业十五分钟”的目标设定, 此目标非彼目标。研究缺乏生态效度。为了克服专家所提问题, 修改稿在问题提出部分删除“中国梦”内容, 只在讨论部分稍作引申。

(4) 虽然作者发现社会公平和目标承诺的相关, 但这种相关仅是统计学意义的, 不具有现实意义, 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公平和“在 15 分钟内完成 10 道图形逻辑推理题目”或“每天辅导孩子做作业十五分钟”有内在逻辑联系, 且“在 15 分钟内完成 10 道图形逻辑推理题目”的目标承诺意义何在? 这种目标设定与不同阶层者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研究的内在逻辑联系。在目标动机研究与目标追求研究的领域中, 将纸笔测验 (例如, “在 15 分钟内完成 10 道图形逻辑推理题目”等) 作为目标任务是非常常见的 (Bayer & Gollwitzer, 2007; Gawrilow, Gollwitzer, & Oettingen, 2011; Pietsch, Walker, & Chapman, 2003)。在公平研究领域, 通过分配不同的报酬给参与相同纸笔测验任务的被试来考察公平感的研究也不鲜见。例如 1983 年, Messé L. A. 和 Watts, B. L. 发表在 JPSP 上的文章就是要求被试要完成连续 5 个阶段的纸笔测验任务, 每一个阶段持

续时间为 25 分钟，每一个阶段结束后都会获得一定报酬（一部分被试是 0.5 美元，另一部分被试是 1.75 美元），发现社会比较确实显著影响了公平感。

那么，公平感是否会影响后续的纸笔测验任务中的成绩？组织行为学领域中展开的关于组织公平的相关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初步的证据。在组织行为学领域中一些研究表明公平和目标达成之间显著正相关（Brockner et al. 1995; Lind et al. 1990; Earley & Lind 1987），公平理论提供了关于公平对目标达成影响的具体假设和实证研究证据（Adams, 1965; Austin & Walster, 1974），例如当员工知觉到分配不公时候，他就会改变目标达成情况来恢复公平。程序公平模型并没有具体的关于公平与目标达成关系的假设，而是关注于程序公平对态度和目标达成质量的影响上（Lind & Tyler, 1988）。因此，本研究建立在 Messé 和 Watts（1983）基础上，通过纸笔测验来设置一个目标任务，并通过分配实验报酬来操纵公平感，以此考察其对后续纸笔测验任务的动机和成绩的影响。

公平对每个人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相同的。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低阶层者更容易受到社会不公的影响。根据社会阶层心理学理论（Kraus et al., 2012）可知，低阶层者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并感知到较低的社会地位，这限制了他们的行为和追求目标的机会，进而增加了他们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低社会阶层者受教育机会较少，居住的环境较恶劣，并时常受到失业的威胁。即低社会阶层者的社会情境的主要内容是缺少物质资源、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低阶层者追求的目标受到了他们的较少的经济资源和较低社会地位的限制。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使得低社会阶层者形成了一种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社会认知倾向，即情境定向，倾向于认为心理和行为受情境因素的影响。相反，高社会阶层者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并感知到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能自由地追求他们自己设定的目标（Johnson & Krueger, 2005; Lachman & Weaver, 1998）。相对于低阶层者来说，高阶层者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相对不用考虑他们的物质成本。充裕的社会资源和相对较少的社会限制，是高阶层者的社会情境的主要内容。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使得高社会阶层者形成了唯我主义（solipsism）的社会认知倾向，倾向于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忽略和抵制情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Grossmann & Varnum, 2011; Johnson et al., 2011; Kraus et al., 2009; Kraus et al., 2010; Mahalingam, 2003, 2007; Snibbe & Markus, 2005; Stephens et al., 2011; Stephens et al., 2007; Tucker-Drob et al., 2011）。因此，相对于唯我主义的高阶层者来说，情境主义的低阶层者在目标追求过程中更容易受到不公平社会环境的影响。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社会公平对高低阶层目标追求的不同影响，迄今为止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假设的层面，还鲜有实证研究直接考察这一问题。建立在社会阶层心理学基础上，本研究，对于低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能显著正向影响目标承诺；而对于高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影响不显著。

研究现实意义问题。纸笔测验的实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而要使得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就需要扩大研究的外部效度，而本研究进行的是系列研究，其目的正是在确保研究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具有很现实意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研究内部效度。

参考文献：

- Adams, 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267-299.
- Austin, W., & Walster, E. (1974). Reactions to confirmations and disconfirmations of expectancies of equity and inequ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2), 208-216.
- Armor, D. A., & Taylor, S. E. (2003). The effects of mindset on behavior: Self-regulation in deliberative and implemental frames of min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1), 86-95.
- Bargh, J. A., Gollwitzer, P. M., & Oettingen, G. (2010). Motivation. In S.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 pp. 268-316). New York: Wiley.
- Bayer, U. C., & Gollwitzer, P. M. (2007). Boosting scholastic test scores by willpower: The role of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 Self and Identity*, 6(1), 1-19.
- Brandstätter, V., & Frank, E. (2002). Effects of deliberative and implemental mindsets on persistence in goal-directed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10), 1366-1378.
- Brockner, J., Wiesenfeld, B. M., & Martin, C. L. (1995). Decision Fram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urvivors' Reactions to Job Layoff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3(1), 59-68.
- Earley, P. C., & Lind, E. A. (1987). Procedural justice and participation in task selection: The role of control in mediating justice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6), 1148-1160.
- Fujita, K., Gollwitzer, P. M., & Oettingen, G. (2007). Mindsets and pre-conscious open-mindedness to incidental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1), 48-61.
- Gawrilow, C., Gollwitzer, P. M., & Oettingen, G. (2011). If-then plans benefit executive functions in children with ADHD.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0(6), 616-646.
- Gollwitzer, P. M. (1990). Action phases and mind-sets.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Found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 2, 53-92.
- Gollwitzer, P. M., & Sheeran, P. (2006).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and goal achievement: A meta - analysis of effects and processe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 69-119.
- Grossmann, I., & Varnum, M. E. (2011). Social class, culture, and cogni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1), 81-89.
- Heckhausen, H., & Gollwitzer, P. M. (1987). Thought contents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motivational versus volitional states of mind.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1(2), 101-120.
- Johnson, W., & Krueger, R. F. (2005). Higher perceived life control decreases genetic variance in physical health: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twin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1), 165-173.
- Johnson, S. E., Richeson, J. A., & Finkel, E. J. (2011). Middle class and marginal? Socioeconomic status, stigma, and self-regulation at an elite univers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5), 838-852.
- Kraus, M. W., Côté, S., & Keltner, D.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1), 1716-1723.
-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09). 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6), 992-1004.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Review]. *Psychol Rev*, 119(3), 546-572.
- Lachman, M. E., & Weaver, S. L. (1998). The sense of control as a moderator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3), 763-773.
- Little, B. R. (1999). *Personal projects and social ecology: Themes and vari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pp. 501-524). New York, NY, US: Guilford Press.
- Lind, E. A., Kanfer, R., & Earley, P. C. (1990). Voice, control, and procedural justice: Instrumental and noninstrumental concerns in fairness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5), 952-959.
- Mahalingam, R. (2003). Essentialism, culture, and power: Representations of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9(4), 733-749.
- Mahalingam, R. (2007). Essentialism, powe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categories: A folk sociology perspective. *Human Development*, 50(6), 300-319.
- Messé, L. A., & Watts, B. L. (1983). Complex nature of the sense of fairness: Internal standards and social comparison as bases for reward eval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1), 84-93.
- Pietsch, J., Walker, R., & Chapman, E. (2003).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lf-concept, self-efficacy, and performance in mathematics during secondary schoo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5(3), 589-603.
- Sheldon, K. M., Elliot, A. J., Ryan, R. M., Chirkov, V., Kim, Y., Wu, C., . . . Sun, Z. (2004). Self-concorda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four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5(2), 209-223.
- Sheeran, P. (2002). Intention—behavior relation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2(1), 1-36.
- Snibbe, A. C., & Markus, H. R. (2005).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gency, and cho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4), 703-720.
- Stephens, N. M., Fryberg, S. A., & Markus, H. R. (2011). When Choice Does Not Equal Freedom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gency in Working-Class American Contex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1), 33-41.
- 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Townsend, S. S. (2007). Choice as an act of meaning: The case of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5), 814-830.
- Tucker-Drob, E. M., Rhemtulla, M., Harden, K. P., Turkheimer, E., & Fask, D. (2011). Emergence of a gene \times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raction on infant mental ability between 10 months and 2 yea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1), 125-133.
- Webb, T. L., & Sheeran, P. (2006). Does chang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engender behavior change? A meta-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2(2), 249-268.

意见 3：概念问题：什么是“高承诺水平的目标”？社会公平 vs 社会公平感，二者什么关系？

回应：目标承诺被认为是个体选择目标之前的态度性评估，它类似于动机力量。因此可以把目标承诺当作追求目标的动机力量来测量。自我报告法是一种态度导向测量，它是测量目标承诺的常用方法。本研究采用 Hollenbeck, Williams 和 Klein（1989）开发的，胡小勇、车璐和郭永玉（2013）修订的中文版目标承诺量表来进行目标承诺测量的。而高承诺水平的目标，在本研究中操作定义为个体对某目标的承诺水平在该量表中的得高分。

社会公平（social justice）是一种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收益和成本是通过一定的分配规则来进行的；具有政治管理性的程序、标准、规则以及其它决策都应保护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们不仅受到当局，而且受到其他一切社会人员，包括一切公民的有尊严地对待（Jost & Kay, 2010）。该定义三个方面大体上对应着分配公平（Adams, 1965）、程序公平（Thibaut & Walker, 1975）和互动公平（Bies & Moag, 1986; Colquitt, 2001）。社会公平感（perceived social justice）就是人们对上述社会公平理念达成程度的感受（杨音宜，王俊秀, 2011）。社会公平与否是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的（Jost & Kay, 2010）。

参考文献：

- Bies, R. J., & Moag, J. S. (1986).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1(1), 43-55.
- Colquitt, J. A. (2001). On the dimensionalit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3), 386-400.
- Hollenbeck, J. R., Williams, C. L., & Klein, H. J. (1989).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antecedents of commitment to difficult goal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4, 18 - 23.
- Hu, X. Y., Che, L., Guo, Y. Y. (2013). The influence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goal pursui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ttachment styles.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1(5):679-684.
- [胡小勇, 车璐, 郭永玉. (2013). 依恋类型在重要他人影响目标追求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1(5):679-684.]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T.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ition, Vol. 2, pp. 1122-1165).
- Thibaut, J. W., & Walker, 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L.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 Yang, Y. Y., Wang, J. X. (2013). *Research on Social Ment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杨音宜, 王俊秀. (2013). *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意见 4：存在明显的错误，需要再检查。P9 3.1 的研究结果部分“结果表明，社会公平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显著（ $\beta = 0.07, p < 0.01$ ），社会阶层对社会阶层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 = 1.69, p > 0.05$ ），社会公平与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显著（ $\beta = -0.12, p < 0.05$ ）。”高亮部分应该是写错了。

回应：谢谢专家指正。修改稿已经对此笔误予以更正。

意见 5：3.2 和 4.2 分析启动的有效性应该将高、低社会阶层被试的结果应分别进行分析。而且应该报告在不同启动组不同社会阶层被试的数量或百分比。

回应：3.2 准实验：公平情境启动对高底阶层目标承诺影响研究。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首先需要检验自变量公平的启动是否是有效的。且对高、低阶层者的公平启动有效性分别进行分析。首先，在高阶层中，不公平、公平组分别是 23 人、27 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两种公平操纵条件下被试的公平感进行比较。发现公平情境启动下的被试的公平感得分（ $M = 11.444, SD = 3.389$ ）显著高于不公平情境启动下被试的公平感（ $M = 8.348, SD = 2.534$ ）， $F_{(1, 54)} = 12.996, p < 0.001$ 。在低阶层中，不公平、公平组分别是 26 人、30 人。发现在公平情境启动下的被试的公平感得分（ $M = 8.967, SD = 2.218$ ）显著高于不公平情境启动下被试的公平感（ $M = 6.039, SD = 3.899$ ）， $F_{(1, 54)} = 11.436, p < 0.001$ ；此结果表明公平的启动对于高、低阶层均是有效的。

4.2 准实验：公平情境启动对高底阶层目标达成影响研究。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首先需要检验自变量公平的启动是否是有效的。且对高、低阶层者的公平操纵有效性分别进行分析。首先，在高阶层中，不公平、公平组分别是 55 人、61 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两种公平操纵条件下被试的公平感进行比较。发现公平情境启动下的被试的公平感得分（ $M=27.98$, $SD=7.462$ ）显著高于不公平情境启动下被试的公平感（ $M=23.04$, $SD=5.916$ ）， $F_{(1, 114)} = 15.427$, $p < 0.001$ 。在低阶层中，不公平、公平组分别是 79 人、47 人。发现在公平情境启动下的被试的公平感得分（ $M=27.23$, $SD=6.253$ ）显著高于不公平情境启动下被试的公平感（ $M=23.80$, $SD=6.378$ ）， $F_{(1, 124)} = 8.681$, $p < 0.01$ ；此结果表明公平的启动对于高、低阶层均是有效的。

3.3 实验室实验：实验操纵对高底阶层目标承诺影响研究。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首先需要检验自变量公平的操纵是否有效。且对高、低阶层者公平操纵有效性分别进行分析。首先，在高阶层中，少得不公组被试 16 人，公平感受得分 3.13（ $SD=1.996$ ）；公平组 17 人，公平感受得分 6（ $SD=1.225$ ）；多得不公组 15 人，公平感受 3.8 分（ $SD=1.699$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公平启动组与不公平启动组在公平感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F_{(2, 45)} = 13.561$, $p < 0.001$ ；表明少的不公、多得不公和公平组被试的公平感受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接着采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少得不公与多得不公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MD = -0.68$ ）， $SE = 0.60$, $p > 0.05$ ；少得不公与公平组在公平感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 $MD = -2.88$ ）， $SE = 0.58$, $p < 0.001$ ；多得不公与公平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MD = -2.20$ ）， $SE = 0.59$, $p < 0.001$ 。

在低阶层中，少得不公组被试 20 人，公平感受得分 2.40（ $SD=1.429$ ）；公平组被试 21 人，公平感受得分 5.14（ $SD=2.104$ ）、多得公平组分别是 18 人，公平感受得分 3.06（ $SD=1.626$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公平启动组与不公启动组在公平感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F_{(2, 56)} = 13.664$, $p < 0.001$ 。表明少的不公、多得不公和公平组被试的公平感受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接着，采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少得不公与多得不公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MD = -0.66$ ）， $SE = 0.57$, $p > 0.05$ ；少得不公与公平组在公平感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 $MD = -2.74$ ）， $SE = 0.55$, $p < 0.001$ ；多得不公与公平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MD = -2.09$ ）， $SE = 0.56$, $p < 0.001$ ，此结果表明，公平操纵对于高、低阶层者均是有效的。

4.3 实验室实验：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首先需要检验自变量公平的操纵是否有效。且对高、低阶层者公平操纵有效性分别进行分析。首先，在低阶层中，不公平操纵、公平操纵组分别是 34、27 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公平操纵条件下被试的公平感（ $M=5.81$, $SD=1.04$ ）显著高于不公平操纵条件下被试的公平感（ $M=3.65$, $SD=1.84$ ）， $F_{(1, 59)} = 29.84$, $p < 0.001$ ；在高阶层中，不公平操纵、公平操纵组分别是 21、20 人，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公平操纵条件下被试的公平感（ $M=6.35$, $SD=0.93$ ）显著高于不公平操纵条件下被试的公平感（ $M=2.90$, $SD=1.76$ ）， $F_{(1, 39)} = 60.52$, $p < 0.001$ ；此结果表明，公平操纵对高、低阶层者均是有效的。

意见 6： 3.3 和 4.3 分析主观社会阶层的实验操纵改变人们对自己所处相对阶层地位的知觉也应该将原本不同社会阶层的被试分开分析。应该报告在不同组不同社会阶层被试的数量或百分比。

回应： 这两个研究都是首先筛选出客观社会阶层为中等阶层的被试，然后进行主观社会阶层操纵。具体来说，依据陆学艺（2002）提出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依据划分的 10 大社会阶层为阶层的划分标准，本研究选取父亲的职业处于中等阶层（以初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基层管理者、个体工商户和工人为主，占 93.5%；包含少量的农民，占 6.5%）湖北武汉某高校大学生。因此，无法将原有的客观社会阶层分开分析。

参考文献:

Lu, X. Y. (Ed.). (2002).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class research report*.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陆学艺 (Ed.).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丛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意见 7: 研究三为什么不将高低社会阶层被试都考虑在内, 为什么只考虑低社会阶层的被试?

回应: 研究一通过三个研究证实了社会公平感能显著正向影响低阶层者的目标承诺水平。而研究二的三个研究则更进一步考察社会公平感通过目标承诺对低阶层者的目标达成的影响。证实了 Krause (2012) 等人的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即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 低阶层者的目标追求更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公平的环境不利于低阶层者目标追求的动机, 进而影响了其目标达成; 而处于公平的环境中, 低阶层的目标追求动机水平更高, 进而显著正向影响了其目标达成。对于高阶层来说, 变量之间这些关系则不显著。因此, 研究三只考虑如何促进低阶层者的目标达成。

参考文献: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y Review*, 119(3), 546-572.

意见 8: 每个研究都包含三个子研究, 首先是公平感的影响, 其次是公平情境启动下的研究, 再次是公平情境操纵下的研究。那么公平启动和公平操纵之间有什么异同? 为什么要进行这两种区分?

回应: 三个大的研究, 每个大的研究又来三个小的研究, 三个小的研究的逻辑关系是相关研究、准实验研究和实验研究。“公平启动”(准实验, 被试只在一个变量的不同水平上进行了随机分配)和“公平操纵”(完全随机, 被试在所有自变量条件下都进行了随机分配), 三者 in 因果关系的解释上是步步加深。“公平启动”和“公平操纵”的说法没有指明研究 2 和研究 3 之间的逻辑关系, 含义不清, 易引起读者误解, 在修改稿中明确指明了是准实验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区别。

意见 9: 本研究认为公平与不公平情境指导语启动有效, 但并没有与基线值作比较。作者应该首先测查被试的公平感程度, 然后再进行启动, 更有说服力。总共有 106 人, 社会阶层高低分别有 50 人和 56 人, 然后这些人被随机分配到公平和不公平启动组, 应该是每种条件下有 53 人, 但为何现在出现了不对等的情况? 关于方差分析的结果报告, 一般是先报告主效应, 然后再报告交互作用。

回应: 专家建议很具有建设性, 为了证明公平与不公平情境指导语启动有效, 使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 应该首先测查被试的公平感程度, 然后再进行启动, 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会采纳这一做法。在本研究中, 为了尽可能表明, 在分配被试到不同的指导语启动组之前, 被试的公平感之间不存在差异, 采用了随机分配被试的方法。

在三个班级 231 名学生中筛选出 106 人高低阶层被试, 其中高低社会阶层分别有 50 人和 56 人。为了保证是在真实课堂情境中完成该研究, 并没有将所有这 106 名被试召集到实验室, 而是分别在三次不同的课程情境中来完成的, 因为每个课堂高低阶层被试人数不一样, 所以随机分配到公平和不公平启动组的人数也就不一样了, 出现分配到公平启动与不公平启动条件下人数不对等的情况。

关于方差分析的结果报告, 一般是先报告主效应, 然后再报告交互作用。感谢专家建议, 在修改稿中已经遵照执行。

意见 10: 子研究 3 中的“被试”选择父亲职业为中等阶层的大学生, 但为什么“实验设计”却有高低两个阶层?

回应：这两个研究都是首先筛选出客观社会阶层为中等阶层的被试，然后进行主观社会阶层操纵。具体来说，依据陆学艺（2002）提出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依据划分的 10 大社会阶层为阶层的划分标准，本研究选取父亲的职业处于中等阶层（以初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基层管理者、个体工商户和工人为主，占 93.5%；包含少量的农民，占 6.5%）湖北武汉某高校大学生。然后，随机选取其中一部分被试进行主观高阶操纵，剩下一部分被试进行主观低阶操纵

参考文献：

Lu, X. Y. (Ed.). (2002).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class research report*.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陆学艺 (Ed.).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丛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意见 11：研究一的子研究 2 中的阅读材料，在实验材料说明时，表述为“后有三道问题”，但在附录的材料中只有 2 道问题；而且“得分 60 分以下为剔除标准”，没有说明如何计分，60 分是回应对了几道题？其他阅读材料的说明也是如此。

回应：感谢专家细心指导。研究 2，在预实验时，每个阅读材料都有三道题。在经过预实验与访谈之后，发现两道题，一个客观一个主观题足以判断被试是否认真阅读了该实验材料。题目的计分方法是，客观题目 40 分，主观题目 60 分；并将得分 60 分以下为剔除标准。其他阅读材料计分方法也是如此。

编委意见：

文章“不同阶层者的目标追求：社会公平与自我调节的影响”；经两个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的评审（评审意见如下），两个专家都认为该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内容丰富。但是，两个审稿人都指出了研究存在的许多理论、概念、方法性的问题。最后，其中一个审稿人建议退稿，另外一个审稿人建议大修后重审。两位审稿人一致认为存在的问题有：

意见 1：文章写作不规范，不符合学术期刊的要求

回应：对照《心理学报》的要求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稿子共有三篇，其题目分别为：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承诺的影响，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社会公平感与自我调节对低阶层者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并且每一篇都针对两位审稿人的意见进行了相应调整，例如第一篇在写作上先简要介绍目标追求理论，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社会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影响，与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承诺的影响。使得文章格式、结构与逻辑等更符合规范。修改稿中所有图形均为新增的，此外凡涉及到与原稿不同的地方均用蓝色字体予以标识。

意见 2：论文与“中国梦”强行挂钩，不够科学、不够妥当

回应：已经遵照编委和专家建议，前言中删除有关“中国梦”的描述，而在讨论中适当提及。

意见 3：理论基础和铺垫不够严密和准确

回应：已经遵照编委和专家建议，将原稿分为三篇，每一篇的理论基础和铺垫均进行了修改和调整，使之更严密和准确。例如，在修改稿中阐述了公正世界信念的文献在本文研究问题提出的作用。公正世界信念的文献，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背景线索，表明目标追求的领域可以同公平领域的研究关联起来。我们在修改稿第一篇中的“2.1 第三自然段”，修改/补充了这部分内容。修改后的内容为“依据行动阶段模型（Gollwitzer, 1990）可知，在目标设定阶段，公平的社会环境显著影响了目标的可得性，公平环境中个体实现目标的机会更大。因此，当个体感知到社会是公平的时候，其目标承诺水平更高。然而，对于这一理论假设，直到最近 Laurin 等人（2011）才给出间接实证证据。Laurin 等人（2011）让实验组被试阅读一篇关于社会公平的短文（描述加拿大社会越来越公平）；控制组被试阅读一篇与社会公平无关的短文（描述珍稀动物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然后，所有被试完成未来职业目标投入时间和资源的意愿的测量问卷。结果表明，相对于控制组来说，公平启动组被试的追求长期职业目标动机水平更高。随后，采用内隐的启动方法来考察公正世界信念与目标承诺之间关系结果也表明，相对于内隐不公平启动组被试来说，内隐公平启动组报告了更多的目标投入意愿。最后，使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包含了 49 个国家 53394 个被试的样本验证了前面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见，当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需要越高时，其目标承诺水平也就越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公正世界信念这一适应性功能属于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和补偿合理化（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 Gaucher et al., 2010），是基于正义动机（justice motive）这一根本性的幻觉（fundamental control, Lerner, 1980），并不能反映社会公平与否（Furnham, 2003; Gaucher et al., 2010; Lerner, 1980）。而最能直接体现社会公平程度的指标是社会公平感（Jost & Kay, 2010）。基于上述文献分析，本研究中假设社会公平感能显著正向影响目标承诺。”此外，前后逻辑关系及概念的同质性做了要更多介绍，使之研究更加严密。例如，在“3.2 研究 2”部分的第 1 自然段增加了以下表述“可见，本研究将研究 1 中的一般的社会公平感具体到了特殊的就业领域中的公平感，反映的是一般社会公平感中的制度公平、弱势公平”；在“3.3 研究 3”部分第 1 自然段增加了以下表述“可见，本研究将研究 1 中的一般社会公平感具体到了分配公平领域”。

参考文献：

- Furnham, A. (200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5), 795-817.
- Gaucher, D., Hafer, C. L., Kay, A. C., & Davidenko, N. (2010). 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everyday undeserved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 109-118.
- Gollwitzer, P. M. (1999).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strong effects of simple pla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7), 493-503.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T.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ition, Vol. 2, pp. 1122-1165).
- Laurin, K., Fitzsimons, G. M., & Kay, A. C. (2011). Social disadvantage and the self-regulatory function of justice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1), 149-172.
- Lerner, M.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Plenum Press New York.

意见 4：某些概念较为模糊，界定不清晰

回应：概念的表达上，修改后标题和正文中的社会公平都统一精确地表达为“社会公平感”。并对社会公平感与公正世界信念概念进一步澄清。社会公平（social justice）是一种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收益和成本是通过一定的分配规则来进行的；具有政治管理性的程序、标准、规则以及其它决策都应保护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们不仅受到当局，而且受到其他一切社会人员，包括一切公民的有尊严地对待（Jost & Kay, 2010）。该定义三个方面大体上对应着分配公平

(Adams, 1965)、程序公平(Thibaut & Walker, 1975)和互动公平(Bies & Moag, 1986; Colquitt, 2001)。社会公平感(perceived social justice)就是人们对上述社会公平理念达成程度的感受(杨音宜, 王俊秀, 2011)。社会公平与否是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的(Jost & Kay, 2010)。公正世界信念指的是人们有一种基本的需要, 即相信所处的世界是公正的, 在这个世界里, 人们得其所应得, 所得即应得(Lerner, 1980)。这其中蕴含了一种推理, 无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而是与自身行为或品行有着某种因果关系, 是得其所应得。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提供有意义的解释框架和策略帮助人们应对不公正事件的威胁, 在现实或是认知的层面上重建公正感, 降低感知到的不公正感, 这是其基本功能, 也是早期研究关注的重点。其次, 作为一种个人资源或者心理缓冲, 减少不公正事件的消极影响, 维护心理健康, 并促进个体对长远目标的追求。同时, 虽然认知感知重建可能导致对不公正受害者的消极态度, 但是如果从观察者的角度, 之所以进行认知合理化的目的还是在于缓冲不公正的影响, 因此从观察者的角度, 其心理影响仍然是积极的, 只是从社会层面来看, 对受害者不是帮助和补偿, 而是贬损责怪, 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有悖社会道德, 也不利于社会和谐, 因此从社会层面来看, 其影响是消极的。总之, 公正世界信念属于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和补偿合理化(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 Gaucher et al., 2010), 是基于正义动机(justice motive)这一根本性的幻觉(fundamental control, Lerner, 1980), 并不能反映社会公平与否(Furnham, 2003; Gaucher et al., 2010; Lerner, 1980)。而最能直接体现社会公平程度的指标是社会公平感(Jost & Kay, 2010)。

参考文献:

- Adams, 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267-299.
- Bies, R. J., & Moag, J. S. (1986).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1(1), 43-55.
- Colquitt, J. A. (2001). On the dimensionalit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3), 386-400.
- Furnham, A. (200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5), 795-817.
- Gaucher, D., Hafer, C. L., Kay, A. C., & Davidenko, N. (2010). 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everyday undeserved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 109-118.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T.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ition, Vol. 2, pp. 1122-1165).
- Lerner, M.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Plenum Press New York.
- Thibaut, J. W., & Walker, 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L.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 Yang, Y. Y., Wang, J. X. (2013). *Research on Social Ment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杨音宜, 王俊秀. (2013). *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意见 5: 文章过长

回应: 已经遵照专家建议, 对文章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稿子共有三篇, 其题目分别为: 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承诺的影响, 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社会公平感与自我调节对低阶层者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除了上述两位审稿人提出的共同问题, 每位审稿人还各自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 无疑这些问题在文章中都或多或少存在, 这里不再赘述。此外, 两位审稿人没有指出来的问题还有:

意见 6: 本文题目为: “不同阶层者的目标追求: 社会公平与自我调节的影响”, 其中主标题为“不同阶层者的目标追求”, 副标题为“社会公平与自我调节的影响”, 给人的感觉是该系列研究主要目

标是探讨社会阶层和目标追求的关系，但是社会公平和自我调节会调节二者的关系。但是，实际上文章写作上主要以“社会公平与目标追求的关系”为主（引言主体是在谈这个问题），这个关系如何随着社会阶层和自我调节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社会阶层才是调节变量。因此，作者题目需要重新写以体现实际侧重点，并对文章写作做相应调整；或者题目不变，但是对文章写作逻辑做相应调整。目前文章在逻辑上给人感觉较为混乱。

回应：对论文的题目已经做了修改。修改后的稿子共有三篇，其题目分别为：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承诺的影响，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社会公平感与自我调节对低阶层者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并且每一篇都针对以上意见进行了相应调整，例如第一篇在写作上先简要介绍目标追求理论，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社会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影响，与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承诺的影响。使得文章结构与逻辑更清晰。

意见 7：作者报告三个大的研究，每个大的研究又来三个小的研究，三个小的研究的逻辑关系是什么？目前作者讲了，但是并没有讲到位：其中一个审稿人已经问到了，“公平感操纵”和“公平感启动”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每个系列里的研究 2 和 3 的关系并不是作者说的那样，研究一是完全的相关研究（没有实验处理），研究二不是完全的实验（准实验，被试只在一个变量的不同水平上进行了随机分配），研究三才是完全的实验（完全随机），三者在因果关系的解释上是步步加深。作者并没有指明三个研究的内在逻辑关系。

回应：在修改稿中更加明确地论述了三个研究的内在逻辑关系。指明研究 1 是相关研究，研究 2 是准实验研究（被试只在一个变量的不同水平上进行了随机分配），研究 3 是实验研究（完全随机），三者在因果关系的解释上是步步加深。

意见 8：文章总体太长，建议考虑分拆成三篇文章，把每一个文章尽可能写精细和精致。建议修后再审。作者在修改时需要仔细回应审稿人的每一个问题，给出接受或不接受的理由，并做相应修改。

回应：修改后的稿子共有三篇。以下对审稿人的意见进行逐条回应，并对文章进行相应修改。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根据评审意见做了积极回应和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本稿从逻辑和实证描述上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在理论（或讲故事）及数据呈现上，仍然有提升的空间。社会科学十分关注实践意义，或者对于社会政策的应用价值；但在实践、应用之前，更有必要梳理清楚基础理论问题，这样才不至于“朝令夕改”。鉴于本研究所探讨问题的重要意义以及可预期的提升空间，三篇文章经再次修改后均可考虑在学报发表，但是研究二与研究三建议重新投稿（同时审理三篇稿件工作量确实太大）；另外，三篇论文目前的考察变量（甚至研究 1、4、7 的样本）有一定重复性（尤其研究二、三均涉及中介变量“目标承诺”），探讨的问题却又相对独立（尤其研究三单独考察“低阶层”），故不适合连载。当然，考虑到后两个研究实际更具创新意义，建议研究二和研究三可考虑翻译成英文，投给 SSCI 期刊，如此，成果绩效与影响或许更大。关于稿件内容的具体建议如下：

意见 1：作者关于社会公平感（含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与结果公平）的澄清比较详细，也是对前人研究的一种整合创新。但整合创新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大杂烩”，整体思维有余、而分析思维不足——后者才是科学研究的关键。具体而言，作者虽然对社会公平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和测量，但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仍然采用的是综合指标。例如，这五个维度中较有新意的是互动公平，相信读者也很有兴趣知道不同维度对目标承诺、目标达成的影响有何不同——这才是我们对一个综合概念进行维度区分的意义所在。或者，我们从研究 2、3、5、6、8、9 的实验启动材料来看，全文所聚焦的社会公平感其实与互动公平没有关系。

回应：通过对第一篇研究 1 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可知，在社会公平感的五个维度中，分配公平感的得分最低，并且分配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最大（ $\beta=0.37, p<0.01$ ）；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大小，接下来依次是权利公平感（ $\beta=0.33, p=0.01$ ）、制度公平感（ $\beta=0.27, p<0.05$ ）、弱势公平感（ $\beta=0.26, p=0.05$ ）、互动公平感（ $\beta=0.20, p<0.06$ ）、社会公平感总分（ $\beta=0.08, p<0.01$ ）。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结果（N= 174）

	<i>M</i>	<i>SD</i>	1	2	3	4	5	6	7	8
1. 社会公平感总分	125.12	23.07	1							
2. 弱势公平感	29.33	5.64	0.87***	1						
3. 权利公平感	33.21	6.86	0.93***	0.73***	1					
4. 制度公平感	20.59	5.77	0.84***	0.64***	0.75***	1				
5. 互动公平感	25.22	5.50	0.88***	0.73***	0.76***	0.65***	1			
6. 分配公平感	16.75	3.20	0.67***	0.52***	0.57***	0.41***	0.54***	1		
7. 社会阶层	0.56	0.50	0.21**	0.20**	0.20**	0.22**	0.16*	0.11	1	
8. 目标承诺	33.18	8.09	0.23**	0.18*	0.28***	0.19*	0.13	0.15*	0.16*	1

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更多涉及到的是分配公平、制度公平、弱势公平等社会公平感的维度。分析过程如下。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除互动公平感之外，社会公平感及其另 4 个维度均与目标承诺显著正相关；社会阶层与目标承诺之间显著正相关。社会公平感及其 5 个维度与社会阶层的相关虽然大多数显著，但相关相对较小，说明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具有相对独立性，适合后续的调节效应检验（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2005）。

（1）总社会公平感与目标承诺：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依据前人的研究，以社会公平感为自变量，以社会阶层为调节变量，以对学习的目标承诺为因变量来考察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阶层交互的预测作用。遵循 Aiken 和 West（1991）的建议，首先将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阶层中心化，中心化分数的乘积代表着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然后采用 enter 法进行同时性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显著（ $\beta=0.07, p< 0.01$ ），社会阶层的作用不显著（ $\beta=1.69, p> 0.05$ ），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显著（ $\beta= -0.12, p< 0.05$ ）。为了更详细考察交互作用，本研究遵循 Cohen 和 Cohen（1983）的建议，对交

互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simple slope test)。结果发现,低社会阶层者的社会公平感能显著正向预测其目标承诺水平 ($\beta=0.14, p<0.001$),高社会阶层者的社会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02, p>0.05$)。图 1 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交互作用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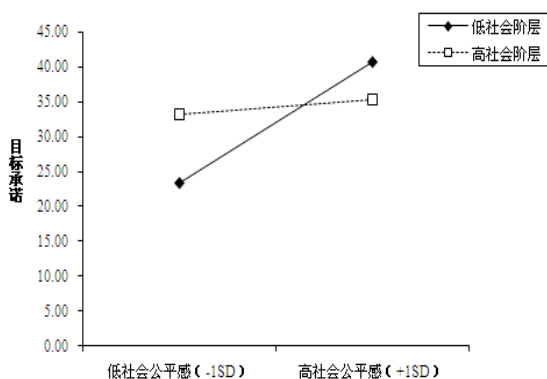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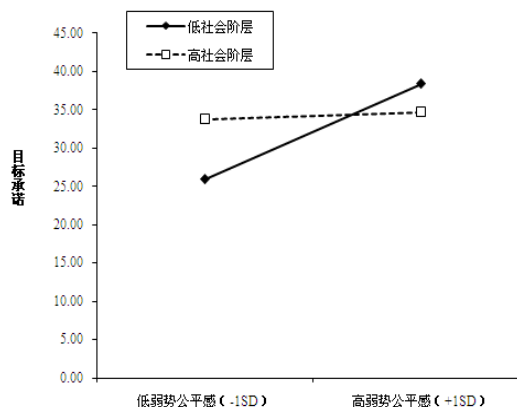


图 2 弱势公平感与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分析

(2) 弱势公平与目标承诺: 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依据 Hayes 和 Matthes(2009)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弱势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显著 ($\beta=0.21, p<0.05$),社会阶层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1.93, p>0.05$),二者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beta=-0.41, p<0.07$)。为了更详细考察交互作用,本研究遵循 Cohen 和 Cohen (1983) 的建议,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simple slope test)。结果发现,低社会阶层者的弱势公平感能显著正向预测其目标承诺水平 ($\beta=0.45, p<0.01$),高社会阶层者的弱势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03, p>0.05$)。图 1 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交互作用的效果。图 2 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交互作用的效果。

(3) 权利公平与目标承诺: 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依据 Hayes 和 Matthes(2009)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权利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显著 ($\beta=0.27, p<0.01$),社会阶层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1.65, p>0.05$),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beta=-0.34, p<0.05$)。为了更详细考察交互作用,本研究遵循 Cohen 和 Cohen (1983) 的建议,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simple slope test)。结果发现,低社会阶层者的权利公平感能显著正向预测其目标承诺水平 ($\beta=0.47, p<0.01$),高社会阶层者的权利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12, p>0.05$)。图 2 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交互作用的效果。图 3 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交互作用的效果。

(4) 制度公平与目标承诺: 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依据 Hayes 和 Matthes(2009)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显著 ($\beta=0.24, p<0.05$),社会阶层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1.78, p>0.05$),二者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beta=-0.38, p<0.08$)。为了更详细考察交互作用,本研究遵循 Cohen 和 Cohen (1983) 的建议,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simple slope test)。结果发现,低社会阶层者的制度

公平感能显著正向预测其目标承诺水平 ($\beta=0.46, p<0.01$)，高社会阶层者的制度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08, p>0.05$)。图 2 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交互作用的效果。图 4 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交互作用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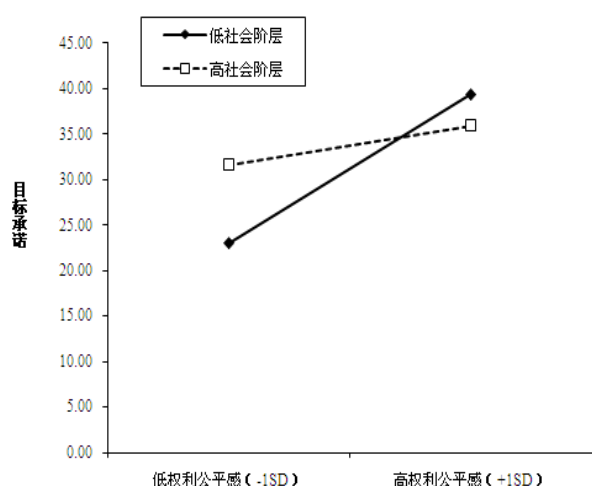


图 3 权利公平感与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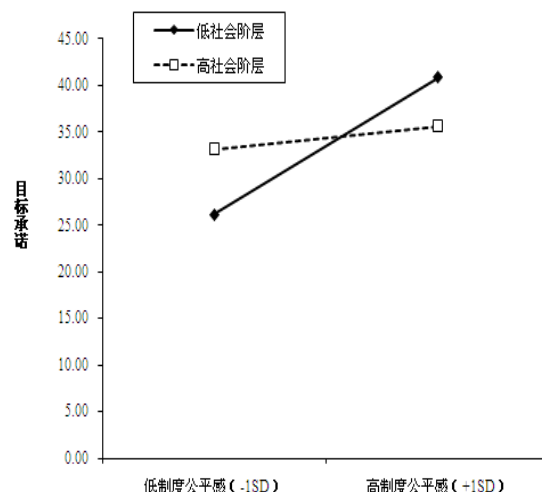


图 4 制度公平感与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分析

(5) 分配公平与目标承诺：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依据 Hayes 和 Matthes(2009)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分配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显著 ($\beta=0.29, p>0.05$)，社会阶层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边缘显著 ($\beta=2.23, p<0.06$)，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beta=-1.02, p<0.01$)。为了更详细考察交互作用，本研究遵循 Cohen 和 Cohen (1983) 的建议，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 (simple slope test)。结果发现，低社会阶层者的分配公平感能显著正向预测其目标承诺水平 ($\beta=0.87, p<0.01$)，高社会阶层者的分配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16, p>0.05$)。图 2 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交互作用的效果。图 5 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交互作用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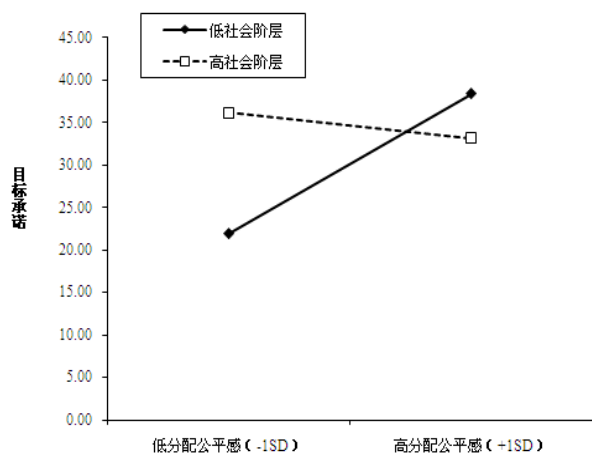


图 5 分配公平感与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分析

(6) 互动公平与目标承诺：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依据 Hayes 和 Matthes(2009)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互动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eta=0.16, p>0.05$),社会阶层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eta=2.17, p>0.05$),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beta=-0.29, p>0.05$)。虽然互动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边缘显著,但是阶层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即无论是高阶层还低阶层,“政府不在意群众的想法、不会与群众沟通,没有接受有关机构的监督”等互动公平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都不显著。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在社会公平感的五个维度中,分配公平感的得分最低,并且分配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最大($\beta=0.37, p<0.01$);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大小,接下来依次是权利公平感($\beta=0.33, p=0.01$)、制度公平感($\beta=0.27, p<0.05$)、弱势公平感($\beta=0.26, p=0.05$)、互动公平感($\beta=0.20, p<0.06$)、社会公平感总分($\beta=0.08, p<0.01$)。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更多涉及到的是分配公平、制度公平、弱势公平等社会公平感的维度。

意见 2: 作者希望突出“社会公平感”这个指标的客观性(类似于民意或舆情动向),但客观的社会公平一般还是用就业率、入学率、犯罪率、基尼系数等经济指标来度量。就目前社会心理学对 social justice 的文献积累来看,主观上相对积极的社会公平指标主要是 Justice Sensitivity (Other-Related, 见: Schmitt et al, 2005);其他主观认知或信念大多还是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相背离,即我们主观上认识的 justice 恐怕都可能忽视、甚至加剧 injustice。社会科学关于 Justice 的研究,至今仍很难突破罗尔斯《正义论》的框架——认识不到 injustice 的实然性,怎么可能理解现实、改变现实、进而达成真正的 justice 呢?

回应: 谢谢审稿专家对于 social justice 这一概念的精到阐述,对本文作者们有非常大的启发。在审稿专家的关于主观和客观 social justice 的论断基础上,本文作者们对近年来关于 social justice 以及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文献进行了进一步整理,支持了专家的意见。

社会公平(social justice)有多种不同的定义。Constantine 等(2007)将其定义为:对资源、权利和对待社会中不能享有同等权力的被边缘化个体和群体的一个基本公平与公正的价值评估;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个体或群体主要指的是因为他们的移民,种族,民族,年龄,社会经济,宗教遗产,体能,或性取向身份而形成群体(p. 24)。Cook (1990)在定义 Social justice 时也注意到了在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间分配利益和权利的重要性;Toporek 和 Williams (2006)在定义 Social justice 则强调了共同参与决策制定和共同采取行动等过程的重要性;Fouad 等(2006)关注于确保机会和资源在一个社会中能公平地分配,而当不公平分配情况出现时,就应采取行动努力确保公平。我们采用的是 Jost 和 Kay (2010)定义,指的是一种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收益和成本是通过一定的分配规则来进行的;具有政治管理性的程序、标准、规则以及其它决策都应保护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们不仅受到当局,而且受到其他一切社会人员,包括一切公民的有尊严地对待(Jost & Kay, 2010)。该定义的三个方面大体上对应着分配公平(Adams, 1965)、程序公平(Thibaut & Walker, 1975)和互动公平(Bies & Moag, 1986; Colquitt, 2001)。

社会公平感(perceived social justice)就是人们对上述社会公平理念达成程度的感受(杨音宜,王俊秀,2011)。社会公平与否是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的(Jost & Kay,2010)。Torres-Harding 等(2014)建立在上述理论概念基础上,以大学生为被试,在开放式问卷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首次明确了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由三个方面构成的: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接受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来自于各种不同人群中的人;通过行为或采取行动来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不公。该定义的第一、第二

方面与美国文化价值观(Stewart and Bennett, 1991)相符合, 它强调个体自由、权利、平等, 而且这些权利应该属于我们社会中所有成员所享有, 而无论该成员的出生地、阶层、宗教、民族、性别以及家庭地位。该定义的第一第二方面更像表述一种理想, 而不是一个过程, 一种行动或一个具体行为。该定义的第三个方面, 促进社会公平和减少社会不公, 初看起来, 好像是多余的或仅仅是重复了前面两个方面。然而只有当人们频繁地支持或赞同最后一个类别的社会公平, 才有可能更少地相信公正世界。也就是说, 在涉及社会公平时候, 促进社会公平和减少社会不公的观念, 对于转变一个人的“公正世界信念(just world)”非常的重要。这也就是说要转变一个人的公正世界信念价值观, 在谈论 social Justice 时, 需要明确地指出其定义中包含了伸张正义(righting wrongs), 即需要采取行动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不公; 而不仅仅是认为 social Justice 为每个人享有的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而现有的绝大多数关于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的定义, 包括本研究的定义中通常都不包含通过行动来伸张正义这一维度的, 因此可以说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与 just world 是很难区分开的。

参考文献:

- Torres-Harding, S. R., Steele, C., Schulz, E., Taha, F., & Pico, C. (2014). Student percep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justice activities.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1746197914520655.
- Cook SW (1990) Toward a psychology of improving justice: research on extending the equality principle to victims of social injust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6: 147-161.
- Toporek RL and Williams RA (2006)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practice of social justice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In: Toporek RL, Gerstein L, Fouad NA, et al. (eds) *Handbook for Social Justice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17-34.
- Fouad N, Gerstein LH and Toporek RL (2006) Social justice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y in context. In: Toporek RL, Gerstein LH, Fouad NA, et al. (eds) *Handbook for Social Justice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Leadership, Vision, and Ac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1-15.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T.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ition, Vol. 2, pp. 1122-1165).
- Adams, 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267-299.
- Thibaut, J. W., & Walker, 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L.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 Bies, R. J., & Moag, J. S. (1986).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1(1), 43-55.
- Colquitt, J. A. (2001). On the dimensionalit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3), 386-400.

意见 3: 作者有很强的愿望来强调社会公平感较之 Just-World Belief 与 System Justification 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我们十分理解每一位研究者对自己的工作成果的珍视。然而, 经过对社会公平感问卷各个条目的仔细梳理, 不难发现多数条目实际与 Just-World Belief 或 System Justification 有重合之处。例如第 6 题(“不同工作能力的人, 工资有差异”)与第 21 题(“人们的所得取决于他的表现”)测的是 just-world 的具体情境, 而第 1 题(“社会有比较健全的法制”)和第 22 题(“社会制度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的公平竞争”)测的也是 System Justification 的具体情境(原量表附后)。Just-World Theory 和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一个从 deserving 的角度关注善、恶报偿是否得当的问题, 一个从 justification 的角度关注社会制度是否需要变革的问题——我们今天关于 Justice 的研究很难绕过或突破这两个理论, 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理论近几十年影响如此巨大的原因; 这也是作者发现的阶层效应与目标承诺效应跟上述理论在国内、外的发现逻辑如此一致的原因。当然, 作者用一个综合指标, 同样发现了类似结果, 并且将结论推广至目标达成和执行意向领域, 具有重要的创新和实践价值。一个好的理论影响何其深远! 另起炉灶何其难也! 为何要在很难有创新的地方突出自己的独特性? 而又为何在已经实现创新的地方(如互动公平, 目标达成, 执行意向等)着墨不足?

Just-World Belief Scale (Dalbert, Schmitt, & Montada, 1985):

1. I think basically the world is a just place.
2. I believe that, by and large, people get what they deserve.
3. I am confident that justice always prevails over injustice.
4. I am convinced that in the long run people will be compensated for injustices.
5. I firmly believe that injustices in all areas of life (e.g., professional, family, politic) are the exception rather than the rule.
6. I think people try to be fair when making important decisions.

General System Justification scale (Kay & Jost, 2003):

1. In general, you find society to be fair.
2. In general,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operates as it should.
3. American society needs to be radically restructured (R).
4.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b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live in
5. Most policies serve the greater good.
6. Everyone has a fair shot at wealth and happiness.
7. Our society is getting worse every year (R).
8. Society is set up so that people usually get what they deserve.

回应：大量的研究表明较强公正世界信念与各种环境中的公平感相联系的(Hafer & Olson, 1998; Olson & Hafer, 2001)。虽然公平感问卷中包含有公正世界信念的内容，但较强的公正世界信念与情境中的公平感相关，并不能仅仅归因于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和公平感问卷的重合所致(Hafer & Olson, 1998; Olson & Hafer, 2001)。

公正世界信念与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实验研究和相关研究中找到证据。在相关研究中，作为个体差异的公正世界信念与广泛的社会系统中的公平感相关，例如财富的分配(Ng & Allen, 2005)，以及作为具体标准的公平感，包括学生知觉到他们考试分数和老师的公平程度(Dalbert & Maes, 2002)，以及罪犯知觉到法院对他们判决的公平程度(Otto & Dalbert, 2005)。较强的公正世界信念也显著正向预测了负性事件结果中的公平感，包括对自己负性事件的公平感知(e.g., Ball, Trevino, & Sims, 1994)和对他人负性事件的公平感知(e.g., Dalbert, Fisch, & Montada, 1992)。例如，Hafer 和 Correy (1999)考察了作为个体差异的公正世界信念和学生对接收到一个比其预期低得多的考试分数时的反应之间关系，研究者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强，越认为该分数是公平的。

实验所诱发的负性结果（无论是被试还是诱发的第三方）的大量研究也表明，较强的公正世界信念导致更高的公平感(e.g., Correia & Vala, 2003, Study 1; Hafer & Olson, 1989; Hagedoorn, Buunk, & Van de Vliert, 2002)。例如，Hafer 和 Olson (1989)让被试完成一个计算机任务，由此诱发负性结果，研究表明较强的公正世界信念导致了被试对该实验公平程度的更高评定水平。

甚至，研究发现公平感（perceived fairness）在公正世界信念（believe in just world）与系统公正（system justification）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个系统中被感知到是公平的，并且看起来是合理的，因此不需要改变。尽管公平可能是最常见的合理化的观念之一，但是对于一个系统来说，还是可能存在其他合理化的理由（Hafer & Choma, 2009; Tyler, 2006）。即较高的公正世界信念导致了较高水平的公平感，而较高水平的公平感增加了对该情境的合理化程度，即提高了系统公正化水平。

参考文献：

- Tyler, T. R. (2006).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egitimacy and legitim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7, 375 – 400.
- Hafer, C. L., & Olson, J. M. (1998).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sponses to personal misfortune. In L. Montada & M. J. Lerner (Eds.), *Responses to victimizations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p. 65 – 86). New York: Plenum Press.

- Hafer, C.L., & Choma, B.L. (2009).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erceived fairness, and justification of the status quo. In J. Jost, A.C. Kay, & H. Thorisdottir (Ed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pp. 107-1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J. M., & Hafer, C. L. (2001). Tolerance of personal deprivation. In J. T. Jost & B. Major (Eds.), *The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ideology, justice,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157 - 17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g, S. H., & Allen, M. W. (2005). Perception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3, 435 - 454.
- Dalbert, C., & Maes, J. (2002).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s a personal resource in school. In M. Ross & D. T. Miller (Eds.), *The justice motive in everyday life* (pp. 365 - 38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tto, K., & Dalbert, C. (2005).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its functions for young prisoner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9, 559 - 573.
- Correia, I., & Vala, J. (2003). When will a victim be secondarily victimized? The effect of observer's belief in a just world, victim's innocence and persistence of suffering.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6, 379 - 400.
- Ball, G. A., Trevino, L. K., & Sims, H. P. (1994). Just and unjust punishment: Influences on subordinate performance and citizen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2, 299 - 322.
- Dalbert, C., Fisch, U., & Montada, L. (1992). Is inequality unjust? Evaluating women's career chances. *Revue Européenne de Psychologie Appliquée*, 42, 11 - 17.
- Dalbert, C., Fisch, U., & Montada, L. (1992). Is inequality unjust? Evaluating women's career chances. *Revue Européenne de Psychologie Appliquée*, 42, 11 - 17.
- Hagedoorn, M., Buunk, B. P., & Van de Vliert, E. (2002). Do just world believers process unfair authoritative decisions differently?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1, 126 - 145.
- Hafer, C. L., & Olson, J. M. (1989).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nd reactions to personal depr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7, 799 - 823.

意见 4：作者需要严肃考虑不同阶层人生目标的差异问题。尤其研究中使用就业和教育问题作为启动材料，它们对于中国社会的上层而言根本不是问题。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不正是中下层社会得以翻身的最佳路径吗？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领跑者，有太多退学、直接创业的案例——他们的家族背景（包括自身天赋）让他们完全不在意大学和工作，而是雇佣了一大批上了“好大学”、并在他们创立的公司找到“好工作”的员工。

回应：谢谢专家悉心指导。在讨论部分对这一不足予以了阐述。具体内容如下：首先，本研究没有考察不同阶层人生目标的差异问题。“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等就业和教育领域目标，对于中下社会阶层来说是改变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最佳途径，是他们的重要人生目标（陈晓宇, 2012; 李春玲, 2010）；而对于高阶层来说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此，本研究得出的对于高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影响不显著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高阶层者并没有视这些目标为重要人生目标，所以关乎到目标可得性的社会公平没有对目标承诺产生影响。对此，在后续研究中应针对不同阶层的不同重要人生目标来考察社会公平感对目标达成的影响。

意见 5：对原评审意见 1.2 回复时，作者称“从观察者的角度，其心理影响仍然是积极的”，此表述不准确。Lerner (2003) 明确指出，Justice Motive 的双刃剑主要体现在 self-interest 与 social interest 的冲突。Self-interest 意义上的认知和谐与心理健康，未必就是积极的，适度的焦虑不安更具有进化意义上的适应价值。

回应：谢谢专家的指正。对原回复意见已作修改。

意见 6：对原评审意见 1.4 回复时，作者夸大了社会公平感与 just-world belief 与 system justification 的区别，本文的理论逻辑与研究结论与基于前人理论的发现都是一致的，实在不必突出与前人的区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小步创新，不是也很好吗？

回应：谢谢专家的悉心指导。在对社会公平感与 just-world belief 与 system justification 之间关系进行进一步深入文献梳理之后，发现我们之前确有夸大它们之间区别之嫌，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大量的研究表明较强公正世界信念最终与各种环境中的公平感相联系的(Hafer & Olson, 1998; Olson & Hafer, 2001)。另外，因为较强的公正世界信念与情境中的公平感相关，而且公平感问卷中并不明显包含公正世界信念问卷内容，所有二者之间的相关不能仅仅归因于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和公平感问卷的重合所致。

公正世界信念与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实验研究和相关研究中找到证据。在相关研究中，作为个体差异的公正世界信念与广泛的社会系统中的公平感相关，例如财富的分配(Ng & Allen, 2005)，以及作为具体标准的公平感，包括学生知觉到他们考试分数和老师的公平程度(Dalbert & Maes, 2002)，以及罪犯知觉到法院对他们判决的公平程度(Otto & Dalbert, 2005)。较强的公正世界信念也显著正向预测了负性事件结果中的公平感，包括对自己负性事件的公平感知(e.g., Ball, Trevino, & Sims, 1994)和对他人负性事件的公平感知(e.g., Dalbert, Fisch, & Montada, 1992)。例如，Hafer 和 Correy (1999)考察了作为个体差异的公正世界信念和学生对接收到一个比其预期低得多的考试分数时的反应之间关系，研究者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强，越认为该分数是公平的。

实验所诱发的负性结果（无论是被试还是诱发的第三方）的大量研究也表明，较强的公正世界信念导致更高的公平感(e.g., Correia & Vala, 2003, Study 1; Hafer & Olson, 1989; Hagedoorn, Buunk, & Van de Vliert, 2002)。例如，Hafer 和 Olson (1989)让被试完成一个计算机任务，由此诱发负性结果，研究表明较强的公正世界信念导致了被试对该实验公平程度的更高评定水平。

甚至，研究发现公平感(perceived fairness)在公正世界信念(believe in just world)与系统公正(system justification)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个系统中被感知到是公平的，并且看起来是合理的，因此不需要改变。尽管公平可能是最常见的合理化的观念之一，但是对于一个系统来说，还是可能存在其他合理化的理由(Hafer & Choma, 2009; Tyler, 2006)。

总之，较高的公正世界信念导致了较高水平的公正感，而较高水平的公平感增加了对该情境的合理化程度，即提高了系统公正化水平。这个分析意味着，公正世界信念能导致个体接受一个本不合理和本不可接受的环境。例如，一个基于群体的歧视研究中，那些高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感知到更少的歧视，尤其是在面对具体的手歧视对待的情境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

参考文献：

- Tyler, T. R. (2006).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egitimacy and legitim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7, 375 - 400.
- Hafer, C. L., & Olson, J. M. (1998).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belief in a justworld and responses to personal misfortune. In L. Montada & M. J. Lerner(Eds.), *Responses to victimizations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p. 65 - 86). New York: Plenum Press.
- Hafer, C.L., & Choma, B.L. (2009).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erceived fairness, and justification of the status quo. In J. Jost, A.C. Kay, & H. Thorisdottir (Ed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pp. 107-1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J. M., & Hafer, C. L. (2001). Tolerance of personal deprivation. In J. T. Jost & B. Major (Eds.), *The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ideology, justice,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157 - 17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g, S. H., & Allen, M. W. (2005). Perception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3, 435 - 454.
- Dalbert, C., & Maes, J. (2002).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s a personal resource in school. In M. Ross & D. T. Miller (Eds.), *The justice motive in everyday life* (pp. 365 - 38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tto, K., & Dalbert, C. (2005).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its functions for young prisoner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9, 559 - 573.

- Correia, I., & Vala, J. (2003). When will a victim be secondarily victimized? The effect of observer's belief in a just world, victim's innocence and persistence of suffering.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6*, 379 - 400.
- Ball, G. A., Trevino, L. K., & Sims, H. P. (1994). Just and unjust punishment: Influences on subordinate performance and citizen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2*, 299 - 322.
- Dalbert, C., Fisch, U., & Montada, L. (1992). Is inequality unjust? Evaluating women's career chances. *Revue Européenne de Psychologie Appliquée, 42*, 11 - 17.
- Dalbert, C., Fisch, U., & Montada, L. (1992). Is inequality unjust? Evaluating women's career chances. *Revue Européenne de Psychologie Appliquée, 42*, 11 - 17.
- Hagedoorn, M., Buunk, B. P., & Van de Vliert, E. (2002). Do just world believers process unfair authoritative decisions differently?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1*, 126 - 145.
- Hafer, C. L., & Olson, J. M. (1989).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nd reactions to personal depr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7*, 799 - 823.

意见 7：2.3 关于阶层与文化的问题，其实，最近的文化理论已开始将阶层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中国社会中下层、生活艰难者居多，何尝不是一种文化。见：Cohen, A. B. (2009). Many forms of cultur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3), 194-204. 又见：Wu, M. S., Yan, X., Zhou, C., Chen, Y., Li, J., Shen, X., et al. (2011).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silience: Evidence from a collectivistic cul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5*(6), 431-442.

回应：非常赞成专家的观点，并感谢提供的文献。心理学对社会阶层的研究是在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展开的。首先是健康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研究。该理论视角下的研究关注于阶层与身心健康之间关系。例如，相对于低阶层者，高阶层者寿命更长，健康状况更好，遭受肢体残疾的可能性更小（Demakakos, Nazroo, Breeze, & Marmot, 2008）；更多地体验到幸福（Howell & Howell, 2008）；更少地体验到负面情绪（Gallo & Matthews, 2003）。第二是文化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研究。这种观点视阶层为一种文化形式，是一套共有的社会情境，这个社会情境塑造了不同阶层具体的价值观和行为剧本（Grossmann & Varnum, 2011）。例如，实证研究发现，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个体拥有不同礼节规矩（Kusserow, 2004）。第三是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研究。此种观点是建立在社会阶层的劳动观（Marx & Engels, 1848/1973）和文化心理学观点（Grossmann & Varnum, 2011）基础上的，认为客观物质资源和主观感知的社会地位差异导致了高低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处于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人们由于共享的经历，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知倾向。环境所导致的高低阶层者认知倾向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其感知自我、他人和社会的方式（Kraus et al., 2012）。相对于前两种视角来说，社会认知观对社会阶层的研究更全面，更清晰地回应了社会阶层对个体心理行为有哪些影响，是如何影响的。因此，本文涉及的社会阶层心理学理论观点源于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理论与研究。但我们也注意到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社会认知观是建立在文化心理学观点（Grossmann & Varnum, 2011）基础上的，因此在讨论的时候，关于社会阶层与文化部分可以追溯到社会阶层心理学的文化视角的理论及相关研究中来。

社会文化视角将阶层看作一种为同一阶层个体所共享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形式，并在一种阶层的内部塑造出具有阶层特异性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与健康心理学视角仅仅关注身心健康不同，社会文化视角极大地扩展了社会阶层研究的关注面，考察了高低阶层在生活中多种文化载体上的差异，例如礼节(Elias, 1978)、风俗(Bourdieu, 1979)、艺术偏好(Snibbe & Markus, 2005)等，并且对于很多其他方面的差异，也从文化的角度加以解释。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Stephens 及其同事从不同阶层的文化塑造的不同自我出发，来解释高低阶层在学业适应(Stephens, Fryberg, Markus, Johnson, & Covarrubias, 2012; Stephens, Townsend, Markus, & Phillips, 2012)、身心健康(Stephens, Markus, & Fryberg, 2012)和社会不平等(Stephens et al., 2014)等方面的差异。可以说，社会文化视角的很多观点具有很好的、广泛的

解释力，是当今社会阶层心理学不可或缺的 (Grossmann & Huynh, 2013)，但是其理论体系相对比较庞大，在不同研究中所涉及的文化的内容不完全一致，加之文化、自我这些概念本身具有复杂性、模糊性，这使得其理论结构不够清晰，还缺乏一个更统合的理论模型，这有待未来的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 Bourdieu, P. (1979).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 Demakakos, P., Nazroo, J., Breeze, E., & Marmot, M. (2008).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The rol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7, 330-340.
- Elias, N. (1978). *The history of manner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1. New York: Pantheon.
- Gallo, L. C., & Matthews, K. A. (2003). Understand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hysical health: do negative emotions play a rol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1), 10-51.
- Grossmann, I., & Huynh, A. C. (2013). Where Is the Culture in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2), 112-119.
- Grossmann, I., & Varnum, M. E. (2011). Social class, culture, and cogni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1), 81-89.
- Howell, R. T., & Howell, C. J. (2008).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status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536-560.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3), 546-572.
- Kusserow, A. S. (2004). *American individualism: Child rearing and social class in three neighborhood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Marx, K., & Engels, F. (1973/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Karl Marx,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political writings*. Vol. I.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62-98.
- Snibbe, A. C., & Markus, H. R. (2005).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gency, and cho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4), 703-720.
- Stephens, N. M., Fryberg, S. A., Markus, H. R., Johnson, C. S., & Covarrubias, R. (2012). Unseen disadvantage: how American universities' focus on independence undermines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6), 1178.
- Stephens, N. M., Hamedani, M. G., & Destin, M. (2014). Closing the Social-Class Achievement Gap A Difference-Education Intervention Improves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All Students' College Transi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4), 943-953.
- 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Fryberg, S. A. (2012). Social class disparities in health and education: Reducing inequality by applying a sociocultural self model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4), 723.
- Stephens, N. M., Townsend, S. S., Markus, H. R., & Phillips, L. T. (2012). A cultural mismatch: Independent cultural norms produce greater increases in cortisol and more negative emotions among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6), 1389-1393.

意见 8： Messé & Watts (1983)的研究程序中的 0.5 美元和 1.75 美元，或许应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 10 元和 30 元（包含汇率和通货膨胀）。当然，我们十分理解，社会科学研究被试费预算的有限；但这里或确实存在方法上的 bug，虽然结果很漂亮——在社会科学领域，有时候结果漂亮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考虑到生态效度问题及其他复杂社会因素的干扰，有时候不漂亮的结果同样有重要的意义。（生态效度的问题，在讨论部分展开）

回应：谢谢专家指正。在讨论部分对这一问题予以了阐述。具体内容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对公平感采用的不是问卷测量，也不是情境启动的方法，而是实验操纵来进行的。通过分配实验任务报酬来操纵被试的公平感，在前人的研究中被证明是有效的（Austin, McGinn,& Susmilch,1980; Messé & Watts,1983）。例如，Messé和Watts（1983）研究中要求被试完成连续5个阶段的任务，每一个阶段持续时间为25分钟，每一个阶段结束后都会获得一定报酬（一部分被试是0.5美元，另一部分被试是1.75美元），研究结果表明当被试发现自己所得比同伴要少时，体验到了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有研究者将该方法（Brosnan & De Waal, 2003）应用到猴子，使用黄瓜、葡萄有效地操纵了猴子的公平感。本研究要求每个被试完成连续3个阶段的任务，每一个阶段3至5分钟，每一个阶段结束后一部分被试1元人民币，另一部分被试5元人民币，操纵检验结果得出与前人一致结论，

即当被试发现自己所得比同伴要少时，体验到了不公平感。虽然本研究这种实验操纵被试公平感的方法在统计上有效，但相对于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0.5美元和1.75美元来说，1元和5元人民币两种钱数的操纵是否是最合适的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考察。

另外，本研究中对公平感操纵方法和操纵有效性检验结果附下。

采用Messé和Watts（1983）的公平操纵程序进行公平操纵。将所有被试随机分为两个组，一组进行不公平情境操纵，另一组进行公平情境操纵。分三个阶段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数量相同，难度相似（完成一页A4纸问卷，问卷内容为图形逻辑推理题目），3至5分钟即可完成；每一阶段任务完成后都可以获得一份报酬。不公平组被试，在实验第一阶段结束后，一半被试获得1元人民币报酬，另一半被试获得5元人民币报酬；接着，在休息两分钟后，完成第二阶段任务，之前获得1元被试依然得1元报酬，之前得5元报酬的被试依然得5元；休息两分钟后，被试完成对第三阶段任务的目标承诺水平的测量。最后，完成第三阶段任务。公平组被试的所有被试，在实验任务的所有阶段任务完成后获得报酬都是一样的，都是1元。

在进行目标承诺测量之前，进行了连续两次的操纵，对应的差异是2元和10元人民币的差异。并且公平操纵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该操纵是有效的。

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首先需要检验自变量社会公平感的操纵是否有效。且对高、低阶层者公平操纵有效性分别进行分析。首先，在低阶层中，受少得不公平操纵、公平操纵组分别是34、27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公平操纵条件下被试的公平感（ $M=5.81, SD=1.04$ ）显著高于不公平操纵条件下被试的公平感（ $M=3.65, SD=1.84$ ）， $F_{(1, 59)}=29.84, p<0.001$ ；在高阶层中，受少得不公平操纵、公平操纵组分别是21、20人，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公平操纵条件下被试的公平感（ $M=6.35, SD=0.93$ ）显著高于不公平操纵条件下被试的公平感（ $M=2.90, SD=1.76$ ）， $F_{(1, 39)}=60.52, p<0.001$ ；此结果表明，公平操纵对高、低阶层者均是有效的。

意见 9：在讨论部分，作者称“从社会层面考察公平和目标追求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取样问题”。既然取样问题是最突出的问题，为何不重新取样？作为一般的社会科学问题，不涉及太多艰难险阻，为何主要局限是方法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综合两轮评审意见，本文最突出的问题或主要在理论问题，而非方法问题。例如，并未考察长期目标或延迟效应，不同阶层的人生目标差异等。

回应：谢谢专家指导意见。我们在讨论部分进行了修改。具体内容如下：首先，本研究没有考察不同阶层人生目标的差异问题。“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等就业和教育领域目标，对于中下社会阶层来说是改变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最佳途径，是他们的重要人生目标（陈晓宇,2012; 李春玲, 2010）；而对于高阶层来说好大学和好工作则根本不是问题，不会视其为重要人生目标。因此，本研究所得出的对于高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影响不显著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高阶层者并没有视这些目标为重要人生目标，所以关乎到目标可得性的社会公平没有对目标承诺产生影响。对此，在后续研究中应针对不同阶层的不同重要人生目标来考察社会公平感对目标达成的影响。其次，本研究考察了当前我国民众认为较不公平的就业领域中，高低阶层者目标追求上的差异，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当前我国最突出的不公平现象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李春玲, 2006）。那么，在这种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境中，不同阶层人们的目标追求动机和目标达成情况是否存在差异？这是今后研究中要重点去探讨的问题。此外，本研究所考察的目标是短期和中期目标的达成动机情况，在对这样一些目标的追求过程中，本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能起到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而对于长期的目标，或者说值

得一生追求的“梦想”的实现，或许需要依靠其他更重要的心理和社会资源，而社会公平感在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需要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展开。

意见 10：在讨论部分，作者称“最突出的不公平现象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有何依据？为何不是“程序不公”或“互动不公”？

回应：（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2006）指出：“当前，人们反映最为强烈的不公平现象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方面。现有的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前夕（1978 年）全国基尼系数约为 0.30，1988 年上升为 0.38，1995 年进一步上升为 0.45。1995 年以来，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 0.3 左右收入差距较为适中，或者说收入分配较为公平，基尼系数高于 0.4 则表明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分配较为不公。基尼系数 0.45 是一个警戒线，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超过了 0.45，那么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贫富分化现象严重”。

（2）我们在研究 1 中的对社会公平感各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各维度中，被试的分配公平感得分最低（ $M=16.75, SD=3.20$ ），并且与“程序不公”、“互动不公”等差异显著。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结果（ $N= 174$ ）

	<i>M</i>	<i>SD</i>	<i>t</i>	<i>df</i>	<i>sig</i>
1. 弱势公平感	29.33	5.64	68.60	173	.000
2. 权利公平感	33.21	6.86	63.90	173	.000
3. 制度公平感	20.59	5.77	47.07	173	.000
4. 互动公平感	25.22	5.50	60.48	173	.000
5. 分配公平感	16.75	3.20	69.11	173	.000

为了消除专家所指出的“最突出的不公平现象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证据不足这一疑问，我们在讨论部分对相应部分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澄清：“最突出的不公平现象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从研究 1 中的对社会公平感各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各维度中，被试的分配公平感得分最低（ $M=16.75, SD=3.20$ ），并且与程序不公、互动不公等差异显著”。

参考文献：

李春玲. (2006). 不公平现象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 *前线*, 2, 28-29.

意见 11：研究二、三的作图，建议做柱状图，以突出调节效应（结果中最关键的部分），而将中介效应放在正文中介绍。当然，结构方程在处理多变量关系上有技术优势，但是除非以心理统计学专业人员为主要读者，否则理解起来并不直观——结构方程模型的图表或许不太适合呈现中介效应。尤其，本文主要采用实验研究，可借鉴 Science 等 top journal 的办法，把结果方程模型的图表放在附件部分，供专业读者查阅。

回应：已遵照专家指导意见对进行了修改。以第二篇研究 2 为例，介绍修改稿中是如何做柱状图，来突出调节效应的。

(1) 社会公平感启动对目标达成的影响：社会阶层的调节效应

实验分配到不公平启动条件下的低阶层学生有 79 人，目标达成分数为 41.97 (SD=26.15)，高阶层学生有 55 人，目标达成分数为 47.41 (SD=0.82)；实验分配到公平启动条件下的低阶层学生有 47 人，目标达成分数为 60.96 (SD=23.15)，高阶层学生有 62 人，目标达成分数为 48.99 (SD=26.29)。

以社会公平感启动和社会阶层为自变量，以目标达成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公平感启动的主效应显著， $F_{(1, 239)} = 10.34, p < 0.001$ ，偏 η^2 为 0.04，其统计检验力 $1 - \beta$ 为 0.89，表明社会公平感能显著正向影响目标达成，本研究假设 1 得到验证；并且社会公平感启动与社会阶层交互作用显著， $F_{(1, 239)} = 7.40, p < 0.01$ ，偏 η^2 为 0.03，其统计检验力 $1 - \beta$ 为 0.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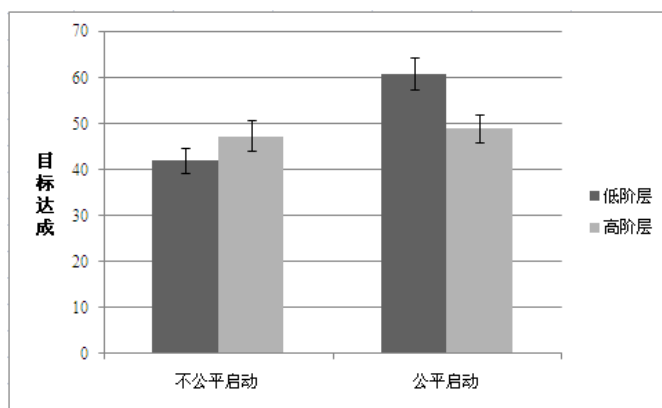


图4 社会阶层在公平感与目标承诺关系中的作用

图 4 清晰地揭示社会阶层如何调节社会公平感与目标达成之间关系。对此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低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显著地影响了目标达成 ($F_{(1,239)}=16.75, p<0.001$)；对于高阶层者来说，公平对目标达成的影响不显著 ($F_{(1,239)}=0.09, p>0.05$)。本研究假设 2 得到验证。

(2) 社会公平感启动对目标达成的影响过程：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根据 Muller, Judd 和 Yzerbyt (2005) 以及叶宝娟, 温忠麟 (2013) 提出的检验程序，运用 Mplus7.0，通过结构方程来检验假设模型。该模型的各项指标为： $\chi^2=0.39, df=1, \chi^2/df=0.39, CFI=1.00, TLI=1.05, RMSEA=0, SRMR=0.01$ ，表明数据对模型的拟合良好。模型中各路径系数见表 5。

如表 5 所示，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阶层的交互项对目标承诺的效应显著 ($a_3 = -0.13, p < 0.05$)；目标承诺对目标达成的效应显著 ($b_1 = 0.49, p < 0.001$)。因此，社会公平感对目标达成的影响是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并且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阶层的交互项通过中介变量目标承诺，进而影响目标达成，即公平→目标承诺→目标达成关系的前半路径受到了社会阶层的调节 (叶宝娟, 温忠麟, 2013; Muller, Judd & Yzerbyt, 2005)。本研究假设 3 得到验证。

表 5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N= 243)

	中介变量：目标承诺		因变量：目标达成	
	β	t	β	t
社会公平启动	$a_1=0.23$	3.64***	$c'_1=0.09$	1.52
社会阶层	$a_2=0.05$	0.75	$c'_2=-0.07$	-1.25
社会公平启动×社会阶层	$a_3=-0.13$	-1.99*	$c'_3=-0.09$	-1.57
目标承诺			$b_1=0.49$	8.81***
目标承诺×社会阶层			$b_2=-0.11$	-1.89

为了揭示社会阶层如何调节社会公平感与目标承诺之间关系，特绘制了图 5。并且对此交互作用简单斜率检验（Cohen&Cohen;1983）结果表明，对于低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显著地影响了目标承诺分数（ $\beta=0.35, p<0.001$ ）；对于高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影响不显著（ $\beta= -0.09, p>0.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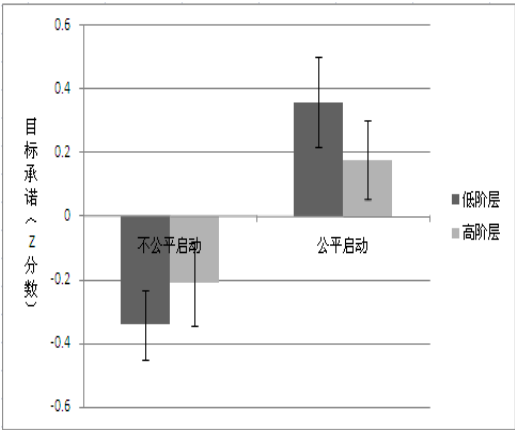


图5 社会阶层在公平感与目标承诺关系中的作用

在社会公平感对目标达成的影响过程中，社会阶层的调节效应为 -0.17，其中直接调节效应为-0.09，间接调节效应为-0.08，间接效应占了 47.06%。由于在调节模型中，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阶层交互项对目标达成预测作用显著；在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中，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阶层交互项对目标达成预测作用仍然显著（ $\beta=-0.09, p>0.05$ ），因此目标承诺在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阶层交互影响目标达成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编委意见：

意见 1：作者需要参考审稿专家的意见，特别是细节方面的意见，建议做相应的修改。

回应：已经遵照编委和专家建议进行修改。文中修改部分均以蓝色予以了标记。

意见 2: 在文章的写作和格式上, 建议做一些小的调整, 以使文章更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文章引言部分, 建议不要用文献回顾这个标题和说法, 这个标题没有告诉你别人你在讲什么, 是无意义的。建议直接根据具体内容来命名。比如第一篇文章, 标题二可以改为: 目标追求: 含义与模型; 标题三可以改为: 目标承诺与社会公平感; 标题四甚至可以不要 (也许可以改为: 目标承诺与社会公平感: 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这样的标题看起来更像在讲故事 (写文章就是讲故事)。

回应: 已经遵照编委建议进行修改。例如, 第一篇每一部分标题如下:

1 引言

1.1 目标追求: 含义与模型

1.2 目标承诺与社会公平感

1.3 目标承诺与社会公平感: 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2 研究 1

3 研究 2

4 研究 3

5 总讨论

6 结论

意见 3: 每篇文章的引言结束部分, 来一个 overview 之类的东西, 对即将介绍的三个研究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来个间接, 呈上启下。

回应: 已经遵照编委和专家建议进行修改。

(第一篇)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 本文分别通过相关研究、准实验研究、实验研究的方法予以考察。研究一为相关研究, 使用问卷法, 通过本土化的社会公平感问卷 (张媛, 2009)、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MacArthur 量表 (Adler et al., 2000)、客观社会阶层量表 (陆学艺, 2002) 以及在 Hollenbeck, Williams 和 Klein (1989) 开发的基础上修订的中文版职业目标承诺量表, 以大学生被试样本来考察高低阶层的社会公平感与职业目标承诺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二为准实验研究, 通过量表筛查出高低阶层不同被试群体, 通过情境启动方式启动被试社会公平感 (Laurin, Fitzsimons, & Kay, 2011), 来考察在不同公平情境中高低阶层大学生对职业目标付出努力的承诺水平。也就是说, 在研究一确立了社会公平感与不同阶层的目标承诺相关关系的基础上, 研究二在自然真实情境中, 通过准实验研究来初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准实验设计, 只操纵了社会公平感, 对社会阶层没有予以操纵; 同时, 是在真实世界中进行, 不可能严格控制自然情境中的各种因素, 使额外变量进入研究, 导致研究二内部效度不如实验室实验。因此, 研究三尝试在实验室情境中, 通过实验设计操纵社会公平感和社会阶层两个变量, 来考察它们对目标承诺的影响。具体来说, 研究三为实验研究, 通过分配金钱 (完成实验任务的报酬) 来操纵公平 (Messé & Watts, 1983), 通过 MacArthur 梯子来操纵主观阶层 (Kraus, Côté & Keltner, 2010; Piff, Kraus, Côté, Cheng, & Keltner, 2010), 来考察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 人们对继续

完成实验任务的动机水平。可见，这三个研究之间关系是，在初步探明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逐步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

（第二篇）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分别通过相关研究、准实验研究、实验研究的方法予以考察。研究一为相关研究，使用问卷法，通过在张媛（2009）的基础上修订的教育公平感问卷，Hollenbeck, Williams 和 Klein（1989）开发的基础上修订的中文版目标承诺量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MacArthur 量表（Adler et al., 2000），客观社会阶层量表（陆学艺, 2002），Oishi 和 Diener（2001）以及 Pomaki, Karoly 和 Maes（2009）基础上修订的中文版目标达成量表，以非学生的成人被试样本来考察教育领域中的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的目标任务达成的预测作用及其过程。研究二为准实验研究，通过量表筛选出高低阶层不同被试群体，通过情境启动方式操纵社会公平感（Laurin, Fitzsimons, & Kay, 2011），来考察社会公平感对高低不同阶层中学生学业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由于研究二是在自然真实情境中进行的准实验研究，只启动了社会公平感，对社会阶层没有予以操纵；同时，是在真实世界中进行，不可能严格控制自然情境中的各种因素，使额外变量进入研究，导致研究二内部效度不如实验室实验。因此，研究三尝试在实验室情境中，通过实验设计操纵社会公平感和社会阶层两个变量，来考察它们对目标达成的影响。具体来说，研究三为实验研究，通过分配金钱（完成实验任务的报酬）来操纵公平（Mess & Watts, 1983），通过 MacArthur 梯子来操纵主观阶层（Kraus, Côté & Keltner, 2010; Piff, Kraus, Côté Cheng, & Keltner, 2010），来考察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被试对继续完成实验任务的动机水平以及实验任务的成绩上的差异。可见，这三个研究之间关系是，在初步探明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逐步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

（第三篇）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分别通过准实验研究、随机分配被试的现场实验研究和实验室实验研究来予以考察。研究 1 为准实验研究，通过指导语方式进行执行意向（自我调节策略）干预，采用修订的教育公平感问卷来测量被试对教育公平的感知来考察执行意向在社会公平感影响低阶层目标达成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及其过程。具体来说，本研究采用张媛（2009）基础上修订的教育公平感问卷来测量被试对教育公平的感知，由班主任老师以致家长一封信的方式，给班上在读学生家长设置一个任务，随后通过采用 Hollenbeck, Williams 和 Klein（1989）开发的基础上修订的中文版目标承诺量表来测量被试对该目标的承诺水平，并随机选取一半被试通过指导语方式进行执行意向干预，另一半被试则不予以执行意向干预。在两周之后，通过采用在 Oishi 和 Diener（2001）以及 Pomaki, Karoly 和 Maes（2009）开发的基础上修订的中文版目标达成问卷来测量被试对这一目标达成情况的主观评定。上述研究 1 虽然对执行意向这一变量予以了操纵，但是对社会公平感是通过问卷来测量的，而未进行实验操纵；为了提高研究内部效度，本研究 2 则除了操纵执行意向外，还在自然真实情境，通过情境启动社会公平感，完全随机分配被试到不同实验组的现场实验方法验证本研究假设。具体来说，本研究首先通过主观社会阶层量表筛选出主客观阶层都低的中学生被试，然后通过情境启动方法启动公平感。然后，分配研究任务，并明确目标，测量被试目标承诺水平。接着，随机选取一部分被试进行执行意向干预，另一部分则不进行执行意向干预。最后，收集被试目标达成分数。上述研究 2 虽然对社会公平感与执行意向予以了操纵，但是在真实的课堂情境中进行的，属于随机分配被试的现场实验研究，

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本研究 3 拟采用实验室实验来验证研究 1 和研究 2 的结论。具体来说，本研究 3 以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对相同的实验任务分配不同的实验报酬来操纵社会公平感；然后分配实验任务，确定目标，并测量被试对目标的承诺水平；接着随机选取一半被试进行执行意向干预，另一半不干预，考察被试在三轮实验结束后任务中的表现，并将其作为目标达成指标。可见，这三个研究之间关系是，在初步探明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因果关系，并逐步提高研究内部效度。

意见 4：文章的三个研究不要放在一个标题下，直接是研究一、研究二、研究三。最后再来一个总讨论。

回应：已经遵照编委建议进行修改。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对社会公平及其功能的关注，以及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实施了 9 项研究，非常值得肯定；对两轮评审意见的回复也基本澄清了评审所提的理论层面的问题。但是，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回复并没有体现在正文的修改中。重要的是，前次评审意见明确指出，三篇论文就研究质量和评审流程而言，不适合在《心理学报》连载；尤其第一篇论文“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承诺的影响”实际只是重复了 Laurin, Fitzsimons & Kay 在 2011 年 JPSP 上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性上均不够——我们不能说，自编了一个量表、换了一群被试，然后只是重复了别人的发现就是创新性研究。具体意见和建议如下：

意见 1：作者已经非常明白“社会公平感”与 Just-World Belief、System Justification 的交叉，在论文的引言部分也把三者混在一起介绍，然后就突然跳跃至“最能直接体现社会公平程度的指标是社会公平感”——后者虽然引用了 Jost & Kay 的文献，但是缺乏实质的论述与展开；本研究中所测量的“社会公平感”（不知作者为何译为 Social Fairness，“感”不见了）主要基于张媛 2009 年的硕士论文，并非 Jost & Kay (2010)文中主要论述的概念。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社会公平感量表是对被试公平感受的描述（1=非常不符合，6=非常符合），而 Just-World Belief、System Justification 是对被试态度的测量（1=非常不赞同，6 或 7=非常赞同），但是，概念的区分与创新更需要理论层面的论述。

回应：（1）社会公平感的翻译予以了更正：社会公平感（perceived social justice）。[见第一篇正文 1.2 的第二段蓝色部分]

（2）社会公平感的概念在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澄清：社会公平是一种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收益和成本是通过一定的分配规则来进行的；具有政治管理性的程序、标准、规则以及其它决策都应保护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们不仅受到当局，而且受到其他一切社会人员，包括一切公民的有尊严地对待（Jost & Kay, 2010）。而社会公平感（perceived social justice）是个体对社会公平程度的感知和评判。即人们以“应有的社会状况”为标准，对社会是否符合这一标准而做出的“公平与否”的判断。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和判断，而“应有的社会状况”反映的是处于相同文化背

景的人们对公平社会的共识。人们通过将现实与这种共识进行对比,判断两者的符合程度,从而得到对社会公平程度的感知和判断,即社会公平感(张媛,2009)。社会公平与否是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的(Jost & Kay, 2010)。[见第一篇正文 1.2 的第二段蓝色部分]

(3) 社会公平感与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在正文中进一步明确:公正世界信念指的是人们的一种基本的需要,即相信所处的世界是公正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Lerner, 1965, 1980)。作为一种个人资源或者心理缓冲,公正世界信念可以减少不公正事件的消极影响,维护心理健康,具有积极适应功能。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公正世界信念得分高的个体对受害者不是帮助和补偿,而是贬损责怪,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有悖社会道德,也不利于社会和谐。因此,从社会层面来看,公正世界信念影响是消极的,它不能促进社会公平治理,也不能反映社会公平与否(Furnham, 2003; Gaucher et al., 2010; Lerner, 1980)。而社会公平感则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该社会的公平程度(Jost & Kay, 2010)。并且,社会公平感中所涉及到的促进社会公平和减少社会不公的观念(例如,残疾人得到了照顾、政府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有利于人们采取行动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不公(Torres-Harding et al., 2014)。但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与各种环境中的公平感相联系(Hafer & Olson, 1998; Hafer & Correy, 1999)。例如,Hafer 和 Correy (1999)考察了公正世界信念与学生对接收到一个比其预期低得多的考试分数时的反应之间关系,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个体,越认为该分数是公平的。实验所诱发的负性结果的大量研究也表明,较强的公正世界信念导致更高的公平感(Correia & Vala, 2003; Hagedoorn, Buunk, & Van de Vliert, 2002)。基于此,本研究中假设社会公平感能显著正向影响目标承诺(H1)。[见第一篇 1.2 第四段蓝色文字部分]

参考文献:

- Correia, I., & Vala, J. (2003). When will a victim be secondarily victimized? The effect of observer's belief in a just world, victim's innocence and persistence of suffering.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6*, 379 - 400.
- Furnham, A. (200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5), 795-817.
- Gaucher, D., Hafer, C. L., Kay, A. C., & Davidenko, N. (2010). 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everyday undeserved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 109-118.
- Hafer, C. L., & Correy, B. L. (1999). Mediator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negative outcom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2*(3), 189-204.
- Hafer, C. L., & Olson, J. M. (1998).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sponses to personal misfortune. In L. Montada & M. J. Lerner (Eds.), *Responses to victimizations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p. 65 - 86). New York: Plenum Press.
- Hagedoorn, M., Buunk, B. P., & Van de Vliert, E. (2002). Do just world believers process unfair authoritative decisions differently?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1*, 126 - 145.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T.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1122-1165). Hoboken, NJ, US: John Wiley & Sons.
- Lerner, M. J. (1965).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as a function of performer's reward and attract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4), 355.
- Lerner, M.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Plenum Press New York.
- Torres-Harding, S. R., Steele, C., Schulz, E., Taha, F., & Pico, C. (2014). Student percep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justice activities.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9*(1), 55-66.
- Zhang, Y. (2009).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Master's degree thesis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张媛. (2009). 中国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结构与测量.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意见 2:关于“社会公平感”五个维度的区分非常有价值,但是理论层面的论述尚显单薄,方法描述尚不清晰。例如,关于分配公正作为 justice concern 的首要问题, Jost & Kay (2010)已经论述得很清楚;倘若仅仅根据政论性期刊《前线》的观点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则略显单薄。我们在结果部分得出分配公正得分最低,但是在研究方法部分却没有五个维度条目内容和条目数量的介绍(作者清楚,但读者

不清楚），所以，读者还是不太容易区分量表的结构，也不清楚得分差异是条目数量、还是被试态度造成的。

回应：回应：二审意见中对应问题是：2.6 在讨论部分，作者称“最突出的不公平现象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有何依据？为何不是“程序不公”或“互动不公”。这里在二审意见回复的基础上进一步回复如下：

首先，在理论方面，分配公平作为公平关切（justice concern）的首要问题的原因：（1）依据 Jost 和 Kay（2010）的论述可知，从社会公平的研究历史上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公平指的就是分配公平（Miller, 1999）。从 Aristotle（ca. 322BCE）的公平观，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公平观（Adelson,1995），再到自由进步派的公平观（Darley, & Pittman, 2003）考察的都是分配公平的问题。在社会心理学中，第一个而且也是影响最广泛的一个对社会公平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考察的也是分配公平的问题（Adams, 1965）。（2）Leventhal（1980）的分配优势模式认为，分配公平在解释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上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人们对某一结果的反应首先取决于分配公平与否。也就是说，只要做出公平的分配，无论分配所遵循的程序是否公平，都会导致积极的后果；反之，只要分配不公平，无论分配所遵循的程序公平与否，都会导致消极的后果。即研究者们认为，相对于其他公平维度，例如程序公平来说，分配公平对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更为重要。（3）McFarlin 和 Sweeney（1993）提出的两因素模型认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不同的后果变量解释和预测力是不同的，程序公正主要预测以组织系统为参照的后果，而分配公正主要预测以个人为参照的后果。Bies 和 Moag（1986）通过考察互动公平，提出了对组织公平后果的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个体在决定如何对权威形象（老板和上司）做反应时依靠的是互动公平，在决定如何对整个组织做反应时依靠的是程序公平。

Masterson 和 Lewis 等（2000）进一步提出代理者一系统模式，其认为组织中的个体要处理两类关系：与直接上司的关系和与组织的关系，互动公平预测与上司有关的后果，程序公平预测与组织有关的后果，互动公平对以代理人为参照的后果比对以系统为参照的后果有更强的预测力。如果把两因素模式和代理者一系统模式综合起来考察，可以构成一个组织公平三维度与效果变量的对应影响模式：分配公平对具体的、以个人为参照的后果有更多的影响；程序公正对一般组织和权威的评价具有更大的影响，预测与组织有关的后果；互动公正主要预测与上司有关的后果（Erdogan, 2002）。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此进行证实，例如，优势分析结果表明，在预测学习投入、情绪衰竭等个体参照的变量时，分配公平的贡献更大；在预班级荣誉感和归属感以及玩世不恭时，程序公平的贡献更大；而在预测与辅导员的关系时，互动公平的贡献更大（李超平,时勘,2003; 周浩,龙立荣,王燕,王中军,吴怡,柯善玉,2005）。而本研究所考察的目标承诺与目标达成则属于以个人为参照的结果变量，因此分配公平感作为一个首要问题来加以考虑。

其次，在实证数据方面，我们在上一轮的回回应中确实忽视了问卷各个维度的条目数量之间存在差异：权利公平（9 个条目，例如“人与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制度公平（7 个条目，例如“这是一个执法公正的社会”）、弱势公平（8 个条目，例如“农民工得到了社会的关照”）、互动公平（7 个条目，例如“政府会与群众进行沟通”）、分配公平（4 个条目，例如“人们所得取决于他的表现”）。也就是说，分配公平感的得分最低这一结论容易受到条目数量的影响。为了克服条目数量对维度分数的影响，我们用**维度平均分**来考察了社会公平感的各个维度及其与目标承诺之间关系。

从下表可知，分配公平感的维度平均分为 4.18 ($SD=0.79$)，显著高于弱势公平感、权利公平感、制度公平感、互动公平感的维度平均分。即在社会公平感的各个维度中，分配公平感的维度平均分最高。尽管如此，分配公平感显著正向预测了目标承诺 ($\beta=0.15, p<0.05$)；互动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13, p>0.05$)。验证了公平的两因素模型和代理者—系统模型的理论观点，分配公平对具体的、以个人为参照的后果（目标承诺）有更多的影响；互动公平对具体的、以个人为参照的后果（目标承诺）的影响较小或不显著（Erdogan, 2002 ; Masterson et al.,2000; McFarlin & Sweeney, 1993）。

从下表中还可知，相对于分配公平感来说，权利公平感、弱势公平感、制度公平感对目标承诺预测力更强。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 McFarlin 和 Sweeney（1993）的两因素模型，还是 Masterson 和 Lewis 等（2000）代理者—系统模型都没有涉及到权利公平感、弱势公平感、制度公平感，因此它们与效果的对应影响模式，两因素模型以及代理者—系统模型都不能进行解释。不同于西方组织领域中所得出的公平三因素论或四因素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人际公平、信息公平）；本研究考察的权利公平、制度公平、弱势公平、互动公平以及分配公平是张媛（2009）从实际出发，通过收集词汇和词语评级，用统计软件自下而上地分析出社会公平感的探索结构，并综合了西方分配公平理论（Adams, 1965）、程序公平（Thibaut & Walker, 1975）、互动公平（Bies & Moag, 1986）及中国古代社会公平思想以及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理论的基础上，确立社会公平感的心理结构。因此，权利公平感、弱势公平感、制度公平感与效果的对应影响模式有待于未来研究进一步考察。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结果 (N= 174)

	<i>M</i>	<i>SD</i>	1	2	3	4	5	6	7	8
1. 社会公平感	3.57	0.66	1							
2. 弱势公平感	3.67	0.71	0.87***	1						
3. 权利公平感	3.69	0.76	0.93***	0.73***	1					
4. 制度公平感	2.94	0.82	0.84***	0.64***	0.75***	1				
5. 互动公平感	3.60	0.79	0.88***	0.73***	0.76***	0.65***	1			
6. 分配公平感	4.18	0.79	0.67***	0.52***	0.57***	0.41***	0.54***	1		
7. 社会阶层	0.56	0.50	0.21**	0.20**	0.20**	0.22**	0.16*	0.11	1	
8. 目标承诺	4.74	1.16	0.23**	0.18*	0.28***	0.19*	0.13	0.15*	0.16*	1

综上可知，分配公平感之所以是公平感关切中的首要问题，不仅因为分配公平在解释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上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人们对某一结果的反应首先取决于分配公平与否（Leventhal, 1980）；还因为对具体的、以个人为参照的后果（目标承诺、目标达成），分配公平感比程序公平感和互动公平感有更多的影响（Erdogan, 2002 ; Masterson et al.,2000; McFarlin & Sweeney, 1993）。研究 1 的数据也表明，分配公平感显著正向预测了目标承诺 ($\beta=0.15, p<0.05$)；互动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13, p>0.05$)。因此, 无论从理论上, 还是实证数据上看, 分配公平感都应作为社会公平感的一个首要问题来予以关注。

需要提及的是, 在对上一轮的二审意见回应中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忽视了问卷各个维度的条目数量之间存在差异, 而导致一个错误结果: “分配公平感的得分最低”。为了克服条目数量对维度分数的影响, 我们用维度平均分来考察了社会公平感的各个维度及其与目标承诺之间关系。得出正确结果是: “社会公平感得分最高, 但分配公平感显著正向预测了目标承诺 ($\beta=0.15, p<0.05$); 互动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13, p>0.05$)”。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一错误?

第一, 这一错误并没有影响到正文 9 个研究结果与结论, 因为正文中涉及到社会公平感问卷的都是各个维度求和得到一个总的社会公平感分数。

第二, 即使正确的结论“在社会公平感各维度中, 分配公平感维度平均分最高”, 推翻了原来的分配公平感得分最低这一结论, 也没有影响本文论点。因为本文探讨的是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的目标动机和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所以哪个类型的公平感得分最高或最低对本研究核心论点和结论不产生影响。

第三, 这一错误对上一轮二审意见(1.1 这五个维度中较有新意的是互动公平, 相信读者也很有兴趣知道不同维度对目标承诺、目标达成的影响有何不同——这才是我们对一个综合概念进行维度区分的意义所在。或者, 我们从研究 2、3、5、6、8、9 的实验启动材料来看, 全文所聚焦的社会公平感其实与互动公平没有关系)的回应造成了影响。上一轮的回复是“在社会公平感的五个维度中, 分配公平感的得分最低, 并且分配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最大 ($\beta=0.37, p<0.01$); 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大小, 接下来依次是权利公平感 ($\beta=0.33, p=0.01$)、制度公平感 ($\beta=0.27, p<0.05$)、弱势公平感 ($\beta=0.26, p=0.05$)、互动公平感 ($\beta=0.20, p<0.06$)、社会公平感总分 ($\beta=0.08, p<0.01$)。因此, 在后续的研究中, 更多涉及到的是分配公平、制度公平、弱势公平等社会公平感的维度”。更正后正确结论为: 互动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13, p>0.05$); 分配公平感显著正向预测了目标承诺 ($\beta=0.15, p<0.05$); 制度公平感显著正向预测了目标承诺 ($\beta=0.19, p<0.05$); 权力公平感显著正向预测了目标承诺 ($\beta=0.28, p<0.001$); 弱势公平感显著正向预测了目标承诺 ($\beta=0.18, p<0.05$); 社会公平感总分显著正向预测了目标承诺 ($\beta=0.23, p<0.01$)。因此, 在后续的研究中, 更多涉及到的是分配公平、制度公平、弱势公平等社会公平感的维度, 而没有涉及互动公平感。可见, 无论是更正前的结果还是更正后的结果, 互动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影响都不显著, 所以本文的研究逻辑基础并没有因为这一原因而产生影响。

第四, 这一错误为上一轮二审意见(2.6 在讨论部分, 作者称“最突出的不公平现象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有何依据? 为何不是“程序不公”或“互动不公”)的回复提供了一个不正确的依据。对此, 我们在讨论部分对相应文字更正(更正文字用蓝色予以了标记)为: 但分配公平感应成为公平关切中的首要问题, 这不仅因为分配公平在解释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上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人们对某一结果的反应首先取决于分配公平与否(Leventhal, 1980); 还因为对具体的、以个人为参照的后果(目标承诺、目标达成), 分配公平感比程序公平感和互动公平感有更多的影响(Erdogan, 2002; Masterson et al., 2000; McFarlin & Sweeney, 1993)。研究 1 的数据也表明, 分配公平感显著正向预测了目标承诺 ($\beta=0.15, p<0.05$); 互动公平感对目标承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13, p>0.05$)。因此, 无论从理论上, 还是实证数据上看, 分配公平感都应作为社会公平感的一个首要问题来予以关注。[见第一篇 5.3 第二段; 第二篇 5.3 第二段; 第三篇 5.4 第二段]

同时，在正文中对社会公平感问卷维度条目予以了说明：社会公平感问卷。对社会公正感的测量采用的是张媛（2009）编制的青少年社会公平感问卷。该量表采用6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6表示“非常符合”）。量表共35个条目，全部为正向计分。量表包含5个维度：权利公平（9个条目，例如“人与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制度公平（7个条目，例如“这是一个执法公正的社会”）、弱势公平（8个条目，例如“农民工得到了社会的关照”）、互动公平（7个条目，例如“政府会与群众进行沟通”）、分配公平（4个条目，例如“人们所得取决于他的表现”）。本研究关注的是总体的社会公平感水平，因此将各个维度求和得到一个总的社会公平感分数。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 α 系数为0.96。[见第一篇2.1.2第二段]

参考文献：

- 李超平, 时勘. (2003). 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对工作倦怠的影响. *心理学报*, 35(5), 677-684.
- 张媛. (2009). *中国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结构与测量*.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周浩, 龙立荣, 王燕, 王忠军, 吴怡, 柯善玉. (2005). 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影响效果的差异. *心理学报*, 37(5), 687-693.
- Adams, 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267-299).
- Adelson, H. L. (1995). The origins of a concept of social justice. *CONTRIBU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354, 25-38.
- Bies, R. J., & Moag, J. S. (1986).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1(1), 43-55.
- Darley, J. M., & Pittman, T. S. (2003). The psychology of compensatory and retributive just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7(4), 324-336.
- Erdogan, B., & Liden, R. C. (2002). Social exchanges in the workplace. *Leadership*, 65-114.
- Hafer, C. L., & Correy, B. L. (1999). Mediator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negative outcom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2(3), 189-204.
- Hafer, C. L., & Olson, J. M. (1998).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sponses to personal misfortune. In L. Montada & M. J. Lerner (Eds.), *Responses to victimizations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p. 65 - 86). New York: Plenum Press.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T.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1122-1165). Hoboken, NJ, US: John Wiley & Sons.
- Leventhal, G. S. (1980). *What should be done with equity theory?* (pp. 27-55). Springer US.
- Leventhal, G. S. (1980). What should be done with equity theory? In K.J. Gergen, ed., M.S. Greenberg, ed., & R.H. Will (Eds.),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7-55). New York: Plenum.
- Masterson, S. S., Lewis, K., Goldman, B. M., & Taylor, M. S. (2000). Integrating justice and social exchange: The differing effects of fair procedures and treatment on work relationshi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4), 738-748.
- Miller, D. (1999). *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weeney, P. D., & McFarlin, D. B. (1993). Workers' Evaluations of the "Ends" and the "Means": An Examination of Four Models of Distributiv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5(1), 23-40.
- Thibaut, J. W., & Walker, 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L. Erlbaum Associates.
- Torres-Harding, S. R., Steele, C., Schulz, E., Taha, F., & Pico, C. (2014). Student percep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justice activities.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9(1), 55-66.

意见 3：另外，英文摘要部分或符合毕业论文的风格，而相对期刊论文来讲过于繁琐，并且在语法上有较大改进空间。例如，标题中的“Different Social Class”及摘要中的“Few Study”显然应为复数形式“Different Social Classes”、“Few Studies”；再如，“The action phase model claimed ... may employ ...”时态不一致，实际我们介绍一个 model 时不必用过去式；“The present research with three studies confirmed that societal fairness influence...”结构、时态均有些怪；不一而足。建议作者请专业为英语或母语为英语的同事或同行修改英文摘要。

回应：已请密苏里大学心理学专业 Xavier 博士和 Ze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对摘要进行了修改。

意见 4：引言部分的小标题“含义与模型”是否想表达“定义与模型”，“含义”这个词太宽泛。

回应：已经遵照专家意见修改。统一为“定义与模型”。[见每一篇 1.1 标题]

意见 5：使用人为设定的缩写、字母、星号的表格一般需要做表注（须检查每一个表格）。

回应：已经遵照专家意见修改。[见第二篇表 2 至表 7；见第三篇表 2 至表 7]

意见 6：小数的小位数一般需要统一。

回应：已经遵照专家意见修改。[通篇每个数字都予以了核查，统一为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意见 7：横坐标为分类变量时，适合做柱状图（而非折线图），如第一篇论文的图 2、3。

回应：已经遵照专家意见修改。[见第一篇图 2、3]

意见 8：柱状图的误差线若不是根据标准误设定，就没有依据在不同图中作出不同长短的误差线；不如虑删除误差线。

回应：已经遵照专家意见修改。[见第二篇图 2 至图 7；第二篇图 2 至图 5]

编委意见：

意见 1：标题“研究 1、2、3”建议改成“研究一”“研究二”“研究三”

回应：已经遵照修改。

意见 2：引言部分新加的最后一段太罗嗦，建议简写为如下的版本：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我们将开展三个研究。研究一为相关研究，运用本土化的社会公平感问卷（张媛, 2009）、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MacArthur 量表（Adler et al., 2000）、客观社会阶层量表（陆学艺, 2002）以及在 Hollenbeck, Williams 和 Klein（1989）开发的基础上修订的中文版职业目标承诺量表，以考察高低阶层的社会公平感与未来职业目标承诺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二为准实验研究，通过情境启动方式启动被试社会公平感（Laurin, Fitzsimons, & Kay, 2011），通过量表测量社会阶层，以考察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大学生的未来职业目标付出努力的承诺水平的影响。研究三为纯实验研究，尝试在实验室情境中，通过操纵社会公平感和社会阶层两个变量，进一步考察它们对目标承诺的影响。总之，三个研究层层递进，在初步探明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验明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三篇文章的引言最后一段作者是否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在不改变愿意的情况下改写一下，以免雷同太多。

回应：（1）第一篇引言最后一段为：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将开展三个研究。研究一为相关研究，运用本土化的社会公平感问卷（张媛, 2009）、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MacArthur 量表（Adler et al., 2000）、客观社会阶层量表（陆学艺, 2002）以及在 Hollenbeck, Williams 和 Klein（1989）开发的基础上修订的中文版职业目标承诺量表，以考察高低阶层的社会公平感与未来职业目标承诺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二为准实验研究，通过情境启动方式启动被试社会公平感（Laurin, Fitzsimons, & Kay, 2011），通过量表测量社会阶层，以考察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大学生的未来职业目标付出努力的承诺水平的影响。研究三为纯实验研究，尝试在实验室情境中，通过操纵社会公平感和社会阶层两个变

量，进一步考察它们对目标承诺的影响。总之，三个研究层层递进，在初步探明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验明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2) 第二篇引言最后一段为：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将开展三个研究。研究一为相关研究，运用修订的教育领域社会公平感问卷、目标承诺量表、目标达成量表，以及主观社会阶层量表(Adler et al., 2000)、客观社会阶层量表(陆学艺, 2002)，以考察成人被试的教育领域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阶层对教育投入相关目标的动机水平和目标达成的预测作用及其过程。研究二为准实验研究，通过情境启动方式操纵社会公平感(Laurin, Fitzsimons, & Kay, 2011)，通过量表测量社会阶层(陆学艺, 2002; Adler et al., 2000)，来考察社会公平感对高低不同阶层中学生学业目标动机和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研究三为纯实验研究，尝试在实验室情境中，通过操纵社会公平感(Messé & Watts, 1983)和社会阶层(Kraus, Côté & Keltner, 2010; Piff, Kraus, Côté & Cheng, & Keltner, 2010)两个变量，进一步考察它们对高低阶层大学生的目标承诺和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可见，这三个研究层层递进，在初步探明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验明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3) 第三篇引言最后一段为：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将开展三个研究。研究一为准实验研究，通过指导语方式进行执行意向(自我调节策略)干预(Koestner et al., 2002)，通过修订的符合中国成人被试量表来测量教育公平感、目标承诺与目标达成，以考察执行意向在教育公平感影响低阶层成人被试为子女的教育投入的目标动机及达成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及其过程。研究二则除了操纵执行意向外，还在自然真实情境，通过情境启动社会公平感，完全随机分配被试到不同实验组的现场实验方法，以考察社会公平感与执行意向对低阶层中学生的学习目标追求动机及目标达成的交互影响与过程。研究三为纯实验研究，尝试在实验室情境中，通过实验操纵社会公平感和自我调节策略(执行意向)这两个变量，进一步考察它们对目标承诺和目标动机的影响及其过程。总之，这三个研究层层递进，在初步探明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验明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四轮

审稿人3意见：

意见 1：通过一系列研究，作者考察了社会阶层，社会公平感和目标承诺与达成之间的关系。前面两位非常优秀的审稿人已经在理论上提出了非常多的重要建议，这方面我就不赘述了。只有一个疑问是，作者那么费劲地区分公正世界信念和社会公平感，但似乎拿来佐证的都是公正世界信念方面的研究，难道就没有社会公平感方面的前人研究吗？相对于公正世界信念，我认为作者提出的社会公平感的概念与系统公正(化)的概念更为接近一些。我也希望看到这两者在概念上的厘清。以下，我将问题主要集中在我看到的方法上面的不足上，其中也包含一些写作上的问题。

回应：(1) 作者那么费劲地区分公正世界信念和社会公平感，但似乎拿来佐证的都是公正世界信念方面的研究，难道就没有社会公平感方面的前人研究吗？

以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perceived fairness, social justice, fairness, goal commitment, goal pursuit, and goal achievement, 社会公平感、社会公平、目标承诺、目标达成、目标追求及其组合(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and goal commitment,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and goal pursuit,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and goal achievement, perceived fairness and goal commitment, perceived fairness and goal pursuit, perceived fairness

and goal achievement,社会公平感与目标达成、社会公平感与目标追求、社会公平感与目标承诺等)作为关键词在 psycINFO, psycARTICLE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science collection , SAGE , google scholar,CNKI 等文献库中搜索的结果表明: 目前为止, 还没有研究直接考察社会公平感与目标追求(目标承诺、目标达成)之间的关系。

现有的文献中, 关于公平感与目标承诺关系的探讨大都在组织领域中展开的, 考察组织情境中程序公平、分配公平对目标承诺的影响。例如, 在组织情境中, 研究者们发现组织公平可以显著地预测目标承诺。例如, Earley 和 Lind (1987) 发现公平与目标承诺之间显著正相关; 而后 Korsgaard 等的研究 (1995) 也表明, 当团队中成员感知到组织中的程序公平水平越高, 其目标承诺水平也越高。Lind 等 (1990) 通过实验研究则表明, 在程序公平的实验情境下, 个体才更有可能接受实验者分配的目标, 并对该目标做出承诺。在不公平的环境中, 个体知觉到达成目标的机会减少, 因此其目标承诺水平会降低 (Locke et al.,1988)。在社会水平, 而不组织(群体)水平来考察社会公平感与目标追求的关系的研究, 迄今为止还没有直接的证据。Laurin 等人 (2011) 在社会层面考察公正世界信念与目标追求关系可视为是第一个间接的证据。因此, 本文假设: 社会公平感能显著正向影响目标承诺水平。其逻辑是, 在组织领域中, 组织公平感显著正向影响目标承诺水平; 在社会领域中, 与社会公平感有显著正相关的公正世界信念能显著正向影响目标承诺, 那么社会公平感也能显著正向影响目标承诺。

(2) 相对于公正世界信念, 我认为作者提出的社会公平感的概念与系统公正(化)的概念更为接近一些。我也希望看到这两者在概念上的厘清。

首先, 定义上的区别。**系统公正化**(system justification)是指个体将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心理过程(有时甚至发生在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Jost & Banaji, 1994)。这一定义中, “系统”是指建立在家庭、机构、组织、社会群体、政府和自然界基础之上的社会安排, “公正化”是指为某些想法或行为提供合法性以及支持的观念。研究表明, 人们会主动维持和正当化自身的社会和政治现状, 尤其是在弱势群体成员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Jost, Pelham, Sheldon, & Sullivan, 2003)。因此, 系统公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人们具有使现状正当化的动机, 即人们会对现状进行心理上的公正化。**社会公平感**(perceived social justice)是个体对社会公平程度的感知和评判。即人们以“应有的社会状况”为标准, 对社会是否符合这一标准而做出的“公平与否”的判断。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和判断, 而“应有的社会状况”反映的是处于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公平社会的共识。人们通过将现实与这种共识进行对比, 判断两者的符合程度, 从而得到对社会公平程度的感知和判断, 即社会公平感 (张媛, 2009; Jost & Kay, 2010)。其中, 社会公平 (social justice)是一种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 收益和成本是通过一定的分配规则来进行的; 具有政治管理性的程序、标准、规则以及其它决策都应保护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人们不仅受到当局, 而且受到其他一切社会人员, 包括一切公民的有尊严地对待 (Jost & Kay, 2010)。该定义三个方面大体上对应着分配公平 (Adams, 1965)、程序公平 (Thibaut & Walker, 1975)和互动公平 (Bies & Moag, 1986; Colquitt, 2001)。社会公平感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就是人们对上述社会公平理念达成程度的感受 (杨音宜, 王俊秀, 2011)。社会公平与否是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的 (Jost & Kay,2010)。

其次, 理论来源的区别。**系统公正化理论**由 Jost 和 Banaji 于 1994 年在对刻板印象正当化功能的研究过程中提出, 与社会认同理论的联系也非常紧密 (Jost, Burgess, & Mosso, 2001)。总体来看, 系统公正化理论的最终形成有三个直接的思想来源, 即谬误意识、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系统公正化理论与这三个理论基础之间的关系就是弱势群体成员中表现出来的系统公正化反映了人们的

谬误意识，违背了人们的公正世界信念，引起了人们的认知失调（梁明明，李晔，李薇娜，2010）。**社会公平感**的理论依据：包括 1965 年 Adams 的分配公平、1975 年，Thibaut 和 Walker 的程序公平、1986 年，Bies 和 Moag 的互动公平及中国古代社会公平思想以及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理论。国外的社会公平的理论看来，权利和财物的分配是他们主要探讨的内容，西方的自由主义风格重视人的独特性，强调分配程序的公正性，无论是财物的占有或转让，还是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群体拟定相应的分配程序。某些理论中的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原则，其主要目的只是弥补之前正义原则的缺憾。对于中国的社会公平理论，一系列公正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着眼更加宏观，对于个体利益的关注度较少，且中国的公平理论比较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它不是某种缺憾的弥补。

再次，功能上的差异。系统公正化在个体水平和社会水平上看，具有不同的功能。从个体水平上看，对于弱势群体成员来说，系统公正化可能在短期内会有正面的情感结果，但是对长期的幸福感来说却会产生负面的结果。Jost 和 Thompson (2000)的研究发现，在优势群体群员中，反对平等与自尊之间是正相关、与抑郁和神经质之间是负相关，在弱势群体成员中，反对平等与自尊之间是负相关、与抑郁和神经质之间是正相关。从社会水平上看，制度正当化的结果可能会抑制改善和转变现状的努力，进而对社会制度和组织的变革产生阻碍。研究表明系统公正化的缓冲功能所产生的副作用就是会减少人们对旨在消除不平衡的社会政策的支持，也会减少对帮助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项目的支持（Wakslak et al., 2007; Montada & Schneider, 1989）。简言之，尽管系统公正化的心理缓冲功能在某些情况下是适应性的，然而，系统公正化的这一功能却阻碍了社会转变，并且从长远来看会对个体和社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成员(Wakslak et al., 2007; Rankin, Jost, & Wakslak, 2009)。社会公平感则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该社会的公平程度（Jost & Kay, 2010）。并且，社会公平感中所涉及到的促进社会公平和减少社会不公的观念（例如，残疾人得到了照顾、政府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有利于人们采取行动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不公（Torres-Harding et al., 2014）。

可见，系统公正化与社会公平感有着很大区别。但正如专家所指，社会公平感、系统公正化和公正世界信念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前人研究告诉我们，发现公平感（perceived fairness）在公正世界信念（believe in just world）与系统公正化（system justification）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个系统中被感知到是公平的，并且看起来是合理的，因此不需要改变。尽管公平可能是最常见的合理化的观念之一，但是对于一个系统来说，还是可能存在其他合理化的理由（Hafer & Choma, 2009; Tyler, 2006）。即较高的公正世界信念导致了较高水平的公平感，而较高水平的公平感增加了对该情境的合理化程度，即提高了系统公正化水平。

参考文献：

- Adams, 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267-299.
- Bies, R. J., & Moag, J. S. (1986).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1(1), 43-55.
- Hafer, C.L., & Choma, B.L. (2009).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erceived fairness, and justification of the status quo. In J. Jost, A.C. Kay, & H. Thorisdottir (Ed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pp. 107-1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T.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1122-1165). Hoboken, NJ, US: John Wiley & Sons.
- Laurin, K., Fitzsimons, G. M., & Kay, A. C. (2011). Social disadvantage and the self-regulatory function of justice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1), 149-172.
- Thibaut, J. W., & Walker, 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L.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 Torres-Harding, S. R., Steele, C., Schulz, E., Taha, F., & Pico, C. (2014). Student percep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justice activities.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9(1), 55-66.
- Tyler, T. R. (2006).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egitimacy and legitim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7, 375 - 400.

- Jost, J. T., & Banaji, M. R. (1994).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1-1.
- Jost, J. T., Pelham, B. W., Sheldon, O., & Ni Sullivan, B. (2003).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reduction of ideological dissonance on behalf of the system: Evidence of enhanced system justification among the disadvantage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1), 13-36.
- Jost, J. T., Burgess, D., & Mosso, C. O. (2001). 15 Conflicts of Legitimation among Self, Group, and System. *The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ideology, justice,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363-388.
- Greenberg, J. (1990). Organizational justice: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Journal of management*, 16(2), 399-432.
- Jost, J. T., & Thompson, E. P. (2000). Group-based dominance and opposition to equality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self-esteem, ethnocentrism, and social policy attitudes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nd European America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6(3), 209-232.
- Wakslak, C. J., Jost, J. T., Tyler, T. R., & Chen, E. S. (2007). Moral outrage mediates the dampening effect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on support for redistributive social polici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3), 267-274.
- Montada, L., & Schneider, A. (1989). Justice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to the disadvantaged.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3(4), 313-344.
- Rankin, L. E., Jost, J. T., & Wakslak, C. J. (2009).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Are the existential benefits of ideology distributed unequally across racial group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2(2-3), 312-333.
- Earley, P. C., & Lind, E. A. (1987). Procedural justice and participation in task selection: The role of control in mediating justice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6), 1148-1160.
- Korsgaard, M. A., Schweiger, D. M., & Sapienza, H. J. (1995). Building commitment, attachment, and trust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teams: The role of procedural just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1), 60-84.
- Liang, M.M., Li, Y., & Li, W.N.(2010). Review on the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11), 1771-1781.
- [梁明明, 李晔, 李薇娜. (2010). 制度正当化理论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1), 1771-1781.]
- Lind, E. A., Kanfer, R., & Earley, P. C. (1990). Voice, control, and procedural justice: Instrumental and noninstrumental concerns in fairness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5), 952-959.
- Locke, E. A., Latham, G. P., & Erez, M. (1988). The determinants of goal commit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3(1), 23-39.
- Yang, Y. Y., Wang, J. X. (2013). *Research on Social Ment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杨宜音, 王俊秀. (2013). *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Zhang, Y. (2009).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Master's degree thesis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 [张媛. (2009). *中国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结构与测量*.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意见 2: 第一篇文章摘要,我不得不注意到摘要在逻辑上不清楚,“对于低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显著正向影响了目标承诺;而对于高阶层者来说,变量之间这些关系则不显著”这一研究结论,并不能佐证”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低阶层者通常很难实现他们的重要人生目标”。只能说明,低阶层者的目标承诺更容易受到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这难道不是适应性的么?换句话讲,你的研究结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低社会阶层个体的目标承诺较低。摘要用反问句的方式,看起来也不大专业。我建议摘要(包括行文中)就事论事,不要将研究的目的讲成似乎是发现了为什么低阶层者目标承诺或目标达成较低的原因(当然,可以放在讨论中进行探讨)。如果你想论证为什么低阶层者目标承诺较低,那么可能的路径是这样的:对于所有人来讲,社会公平感越高,目标承诺就越高,但低阶层的公平感较低,所以他们目标承诺较低,而不是说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个体的影响不同。

回应: 因第一篇文章已被拒稿,所以对于第一篇文章的意见这里不再予以回应。但其中一些意见对第二篇文章的摘要的修改亦有启发意义。例如:“摘要用反问句的方式,看起来也不大专业。我建议摘要(包括行文中)就事论事,不要将研究的目的讲成似乎是发现了为什么低阶层者目标承诺或目标达成较低的原因(当然,可以放在讨论中进行探讨)”。对此,修改了第二篇的摘要。

修改稿为: 基于目标追求理论和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本文通过三个研究,逐步深入地考察了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个体目标达成的影响作用及其过程。研究 1 采用问卷法,考察了高低阶层成人被试的教育领域社会公平感与为孩子进行教育投入目标承诺与目标达成之间的关系;研究 2 采用准实验方法,通过操纵公平或不公平教育情境启动公平感,考察其对高低阶层中学生的学习目标承诺与

目标达成的影响；研究 3 为实验研究，通过实验操纵社会公平感和社会阶层，考察社会公平感对高低阶层大学生的实验任务目标承诺和目标达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通过正向影响低阶层者的目标承诺，进而正向影响起目标达成；而对于高阶层者来说，变量之间这些关系则不显著。这表明：相对于高阶层来说，低阶层者的目标追求易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低阶层者的社会公平感水平越高，其追求目标的动机水平就越高，进而越有利于目标达成。[见摘要部分]

意见 3：三篇文章中，所有的第二个研究的实验操作均发生了混淆，这一问题在第一篇文章中尤其严重。对于不公平的操作，讲的是出生低微的人的工作机会或学习机会更少。对于社会阶层较低的人来讲，所操作的不仅仅是分配不公，而且包含了自己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这一引导。目标承诺降低似乎是目标实现难度增加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就算没有任何社会不公，你告诉我我的未来很悲惨，我也会失去动力，不是吗？而且，这一操作对于两组学生所体验到的公平感的影响是不同的，高阶层个体在不公平情境下所体验到的公平感，与低阶层个体在公平情境下所体验到的公平感基本持平（这里操作检验应该用方差分析一起做，而不是两组分开做）！我认为这一研究结果对于验证假设是没有说服力的。

回应：（1）关于三篇文章中，所有的研究二对实验操作发生混淆。对于社会阶层较低的人来讲，所操作的不仅仅是分配不公，而且包含了自己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这一引导。目标承诺降低似乎是目标实现难度增加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就算没有任何社会不公，你告诉我我的未来很悲惨，我也会失去动力，不是吗？

这里只针对第二篇研究的研究二进行回回应。研究二进行实验操作的变量为社会公平感，具体操作方法：首先将招募的典型高阶层和典型低阶层被试随机分配到公平启动组或不公平启动组，然后阅读摘自国内两篇权威的报纸《新华日报》或《人民日报》中关于教育公平或不公平的报道。这种通过公平的或不公平的社会现实报道来启动被试的公平感或公平信念在前人的研究中很常见，例如Laurin, et al. (2011)的研究3中采用的研究方法。

诚如专家所说，这种方法来操纵低阶层的不公平感时，所操作的不仅仅是（分配）不公，而且包含了自己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这一引导。例如：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累积的数据表明，出身在社会下层的青年更少进入大学进行深造，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几率较低。即这种操纵公平感的方法可能导致目标难度这一额外变量的产生。

但目标难度对目标追求是否有影响？目标承诺降低似乎是目标实现难度增加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吗？Atkinson（1958）以任务成功可能性作为难度指标，发现中等难度的任务，个体最为努力；当任务非常难或非常容易时，个体的努力程度最低。然而，Atkinson考察的客观任务的难度，没有考察个体设定的目标与被试主观认定的目标难度；并且，当测量并控制个体设定的目标后，上述研究结论并不能得到验证（Locke & Latham, 1990）。Locke 和Latham（1990）研究发现，高难度的目标导致高的目标动机水平。甚至，有研究者指出非常困难的目标也常常激发人的斗志。对于那些非常具有吸引力（desirability），同时又非常困难的目标来说，人们通常是通过采取直接的行动，克服困难，而不是改变对该目标的看法，认为其没有吸引力（de Ridder & Kuijer, 2006）。但也有研究表明，目标难度并不能影响目标动机（Linde, Jeffery, Finch, Ng, & Rothman, 2004），元分析的结果表明目标难度本身对目标追求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Erez & Zidon, 1984）。可见，目标难度能否影响目标承诺还没有一个一致

结论。但本研究倾向于采取Erez 和Zidon（1984）以及Linde等（2004）的观点，目标难度本身并不能对目标追求动机产生影响，目标承诺降低并不是目标实现难度增加的理所当然的结果。

（2）这一操作对于两组学生所体验到的公平感的影响是不同的，高阶层个体在不公平情境下所体验到的公平感，与低阶层个体在公平情境下所体验到的公平感基本持平（这里操作检验应该用方差分析一起做，而不是两组分开做）！

原稿中对社会公平感启动有效性的检验是用方差分析一起做，而不是两组分开做。具体结果如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两种公平操纵条件下的被试的公平感进行比较。结果如下表所示，在公平情境启动下的被试的公平感得分（ $M=5.25$, $SD=1.55$ ）高于不公平情境启动下被试的公平感（ $M=3.07$, $SD=1.52$ ），差异显著， $F(1, 241)=121.54$, $p<0.001$ 。

但是一审专家建议高、低阶层的公平感启动有效性应分开进行检验。在查阅文献后，我们也认为分开检验具有合理性的。因为社会阶层心理学假设高阶层者和低阶层者的认知、情感、行为倾向有着不同，相对于高阶层来说，低阶层更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Kraus, Côté & Keltner, 2010; Kraus, Piff, & Keltner, 2009; Mahalingam, 2003, 2007; Stellar et al., 2012; Snibbe & Markus, 2005）。那么能启动低阶层公平感的情境能否也能启动高阶层的公平感？这就需要将二者分开进行统计分析。

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首先需要检验自变量公平的启动是否是有效的。且对高、低阶层者的公平操纵有效性分别进行分析。首先，在高阶层中，不公平、公平组分别是 55 人、62 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两种公平操纵条件下被试的公平感进行比较。发现公平情境启动下的被试的公平感得分（ $M=27.98$, $SD=7.46$ ）显著高于不公平情境启动下被试的公平感（ $M=23.04$, $SD=5.92$ ）， $F(1, 114)=15.43$, $p<0.001$ 。在低阶层中，不公平、公平组分别是 79 人、47 人。发现在公平情境启动下的被试的公平感得分（ $M=27.23$, $SD=6.25$ ）显著高于不公平情境启动下被试的公平感（ $M=23.80$, $SD=6.38$ ）， $F(1, 124)=8.68$, $p<0.01$ ；此结果表明公平的启动对于高、低阶层均是有效的。[见 3.2.1 部分]

参考文献：

- Atkinson, J. (1958). Towards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human motivation in terms of motives, expectancies and incentives. In J. Atkinson (Ed.), *Motives in fantasy, action and society* (pp. 288–305).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 de Ridder, D., & Kuijer, R. G. (2006). Managing immediate needs in the pursuit of health goals: The role of coping in self-regulation. In D. de Ridder & J. de Wit (Eds.), *Self-regulation in health behavior*, pp. 147–168. Chichester, UK: Wiley. doi:10.1002/9780470713150.ch7
- Erez, M., & Zidon, I. (1984). Effects of goal acceptanc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goal setting and task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9, 69–78.
- Kraus, M. W., Côté, S., & Keltner, D.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1), 1716–1723.
-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09). 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6), 992–1004.
- Laurin, K., et al. (2011). "Social disadvantage and the self-regulatory function of justice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1): 149–171.
- Linde, J. A., Jeffery, R. W., Finch, E. A., Ng, D. M., & Rothman, A. J. (2004). Are unrealistic weight loss goals associated with outcomes for overweight women? *Obesity Research*, 12, 569–576. doi:10.1038/oby.2004.65
- Locke, E. A., & Latham, G. P. (1990). *A theory of goal setting and task performan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Locke, E. A., & Latham, G. P. (2002). Building a practically useful theory of goal setting and task motivation: A 35-year odysse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7(9), 705–717.
- Mahalingam, R. (2003). Essentialism, culture, and power: Representations of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9(4), 733–749.
- Mahalingam, R. (2007). Essentialism, powe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categories: A folk sociology perspective. *Human Development*, 50(6), 300–319.
- Snibbe, A. C., & Markus, H. R. (2005).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gency, and cho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4), 703–720.

意见 4: 所有的第三个研究，操作均没有体现社会公平或是不公，只不过是实验室里面的一次结果分配而已，与社会是不是公平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说，考察的是个体得到不公平待遇后的行为反应，但这与你对社会公平感的定义似乎差得比较远。作者总在强调长期处于某一阶层所带来的影响，但看上去，只不过是对社会阶层的很简单的实验操作，被试的心理就发现了即时的变化，这不是自相矛盾么？作者需要对这些问题提供解释。另外，我对研究过程感到好奇，是所有的被试都在同一个房间里同时施侧么？你们那么明目张胆地随机给一些人 1 块钱，给另一些人 5 块钱，就不需要任何借口么？而被试也竟然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都默默地接受了不公平的命运？我有点难以脑补实际的操作过程，请将研究过程表述得更详细些。

回应: (1) 所有的第三个研究，操作均没有体现社会公平或是不公，只不过是实验室里面的一次结果分配而已，与社会是不是公平有什么关系呢？

本研究的第三个研究是通过分配实验任务报酬来操纵被试的社会公平感。通过分配实验任务报酬来操纵被试的分配公平感，在前人的研究中被证明是有效的 (Austin, McGinn, & Susmilch, 1980; Messé & Watts, 1983)。但是这种方法所操纵的分配公平感与社会公平感有什么关系呢？或者如专家所说：“它与社会公平或不公平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回应。

社会公平是一个源于哲学的概念，但后来广泛应用于日常语言和社会科学。通过综合各个不同哲学关切 (Frankena, 1962; Rawls, 1971; Toynbee, 1976)，可以对其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社会公平是一种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收益和成本是通过一定的分配规则来进行的；具有政治管理性的程序、标准、规则以及其它决策都应保护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们不仅受到当局，而且受到其他一切社会人员，包括一切公民的有尊严地对待 (Jost & Kay, 2010)。定义这三个方面大致对应着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不过，研究者们认为，任何一个有关社会公平理论的研究都难以同时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因此，以往的研究者在研究中通常试图解决其中的某一方面的问题 (Jost & Kay, 2010)。

社会公平感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是个体对社会公平程度的感知和评判。即人们以“应有的社会状况”为标准，对社会是否符合这一标准而做出的“公平与否”的判断。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和判断，而“应有的社会状况”反映的是处于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公平社会的共识。人们通过将现实与这种共识进行对比，判断两者的符合程度，从而得到对社会公平程度的感知和判断，即社会公平感 (张媛, 2009; Jost & Kay, 2010)。社会公平与否是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的 (Jost & Kay, 2010)。本文所采用的是张媛 (2009) 的社会公平感概念，其中就包含权利公平感、制度公平感、弱势公平感、互动公平感、分配公平感等不同维度。而本文的第三个研究考察的是社会公平感中的分配公平感这一维度问题，并将其操作定义为被试主观感受到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报酬是否通过一定的分配规则来进行的。

总之，本文第三个研究通过分配实验任务报酬来操纵被试的分配公平感。分配公平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这种状态中，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报酬是否通过一定的分配规则来进行的。而分配公平感则是个体对分配公平程度的主观感知和评判。分配公平感属于社会公平感的一个维度。可见，本研究通过分配实验任务报酬操纵客观的分配公平引发被试不同的主观分配公平感受，实现社会公平感的操纵。

(2) 作者总在强调长期处于某一阶层所带来的影响，但看上去，只不过是对社会阶层的很简单的

实验操作，被试的心理就发现了即时的变化，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这是针对主观社会阶层的操纵后果与长期处于某一客观社会阶层所具有的心理行为特征之间关系进行的提问。本文的第三个研究中，选取父亲的职业处于中等阶层（以初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基层管理者、个体工商户和工人等）的湖北武汉某高校大学生为被试。依据 Kraus 等人的方法（Kraus, Côté & Keltner, 2010; Piff, Kraus, Côté Cheng, & Keltner, 2010），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进行主观高阶层操纵，另一组进行主观低阶层操纵。那么，这种主观阶层的操纵能导致与长期处于某一客观社会阶层所类似的心理行为反应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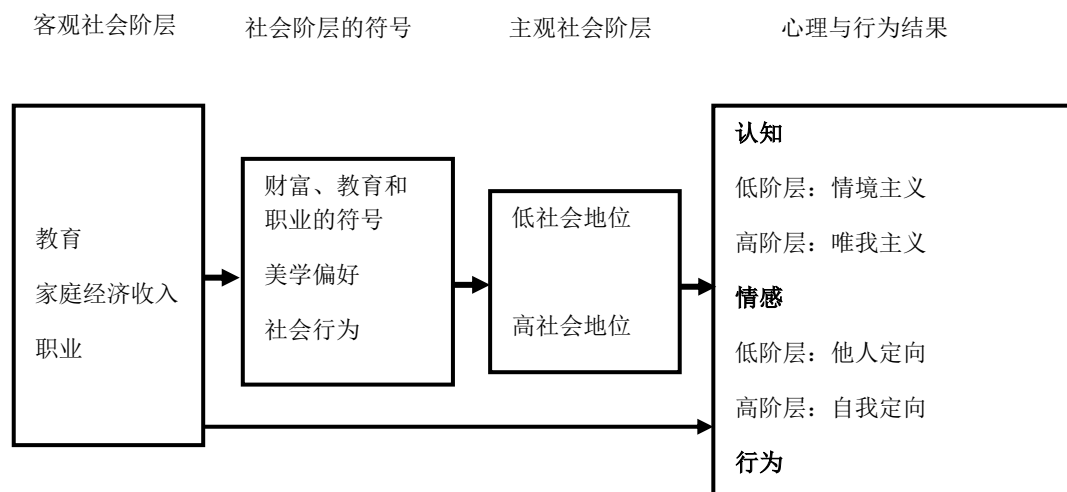


图 1：社会阶层对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影响的作用模型（引自：Kraus, Piff, & Keltner, 2011）

社会阶层心理学及相关研究给出了肯定的回应案。无论是测量的主观社会阶层还是操纵的主观社会阶层，都能导致个体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变化；主观高阶层操纵导致个体在认知上出现唯我主义倾向，情感上自我定向，行为上具有独特性和自私等特征，而这正是长期处于客观高阶层者才有的心理与行为特征；而主观低阶层操纵导致个体在认知上出现情境主义倾向，情感上他人定向，行为上具有与环境一致、亲社会等特征，而这正是长期处于客观低阶层者才有的心理与行为特征（Côté et al., 2010; Horberg et al., 2009; Kraus et al., 2009, 2010; Piff et al., 2010）。因此，本文通过实验操纵主观社会阶层诱发出其心理与行为特征的变化与所强调的客观高低阶层所具有的心理行为特征并不矛盾。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社会阶层心理学对此所进行的完整阐述。

社会阶层心理学（Kraus, Piff, & Keltner, 2011）认为社会阶层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两个过程来实现的：首先，客观的社会阶层，即教育、财富和职业等物质阶层通过财富、偏好和社会行为等符号体现出来。具体来说，社会阶层的客观成分导致了高低阶层者的物质生活上的差异，即他们生活在不同社区，拥有不同的社交圈，上不同学校，吃不同的食物，享受不同形式的娱乐活动，穿着也存在显著的差异（Domhoff, 1998）。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些行为的方式非常可信地与个体的财富、教育和职业相关。可观察的财富、教育和职业符号是社会阶层最直接的符号。其次，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个体对阶层相关的符号的感知和推论就形成了关于自身的主观社会地位的认知。客观的物质资源和主观的社会地位导致了高低阶层者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低阶层者是情境定向的认知方式，他人定向的情感和行为方式；而高阶层则是气质定向的认知方式，自我定向的情感和行为方

式（见图 1）。可见，客观的教育、家庭经济收入和职业的差异是通过主观社会阶层来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此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那些原本在教育、家庭经济收入和职业上差异不显著的客观阶层不同个体，在受到主观社会阶层操纵后，其心理与行为特征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受主观高阶层操纵者，倾向于认为自己是高阶层者，表现出了唯我主义的心理行为特征；相反，受主观低阶层操纵者，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低阶层，表现出了情境注意的心理与行为特征（Co'te' et al., 2010; Kraus et al., 2009, 2010; Piff et al., 2010）。[见 4 研究三第一自然段蓝色标识部分]

（3）另外，我对研究过程感到好奇，是所有被试都在同一个房间里同时施测么？你们那么明目张胆地随机给一些人 1 块钱，给另一些人 5 块钱，就不需要任何借口么？而被试也竟然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都默默地接受了不公平的命运？我有点难以脑补实际的操作过程，请将研究过程表述得更详细些。本研究采用的 Messé 和 Watts（1983）对公平进行操纵的方法。Messé 和 Watts（1983）研究中要求被试完成连续 5 个阶段的任务，每一个阶段持续时间为 25 分钟，每一个阶段结束后都会获得一定报酬（一部分被试是 0.5 美元，另一部分被试是 1.75 美元），研究结果表明当被试发现自己所得比同伴要少时，体验到了强烈的不公平感。

本研究将所有被试随机分为两个组，一组进行不公平情境操纵，另一组进行公平情境操纵。分三个阶段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数量相同，难度相似（完成一页 A4 纸问卷，问卷内容为图形逻辑推理题目），3 至 5 分钟即可完成；每一阶段任务完成后都可以获得一份报酬。不公平组被试，在实验第一阶段结束后，一半被试获得 1 元人民币报酬，另一半被试获得 5 元人民币报酬；接着，在休息两分钟后，完成第二阶段任务，之前获得 1 元被试依然得 1 元报酬，之前得 5 元报酬的被试依然得 5 元；休息两分钟后，被试完成对第三阶段任务的目标承诺水平的测量。最后，完成第三阶段任务。公平组被试的所有被试，在实验任务的所有阶段任务完成后获得报酬都是一样的，都是 1 元。

不公平操纵组被试是在同一个实验室房间，同时施测；公平操纵组被试在另一个房间，同时施测。对于不公平组被试进行操纵时，每一阶段任务完成后，会根据老师（主试）的心情和喜好，有些人会得到 1 块钱，另一些人会得到 5 块钱。实验时，有被试直接站起来对主试表达愤怒，直表述这不公平；另也有少数被试直接放弃任务。只要是在第一轮任务中（没有进行不同报酬分配）认真完成任务，在第二轮和第三轮任务中放弃了，在该研究操作中被视为有效的，并将目标承诺分数记为最低分（总分 7 分），目标达成分数记为 0。但在第一轮任务中（没有进行不同报酬分配）就有超过 15% 空白的，就视为无效的数据，予以了剔除。[见 4.1.2 第三自然段蓝色标识文字]

参考文献：

- Co'te', S., Gyurak, A., & Levenson, R. W. (2010). The ability to regulate emotion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well-being, incom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Emotion*, 10, 923–933. doi:10.1037/a0021156
- Kraus, M. W., Co'te', S., & Keltner, D.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1716–1723. doi: 10.1177/0956797610387613
- Kraus, M. W., & Keltner, D. (2009). Sig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 thin-slicing approach.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99–106. doi:10.1111/j.1467-9280.2008.02251.x
- Piff, P. K., Kraus, M. W., Co'te', S., Cheng, B. H., &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 771–784. doi:10.1037/a0020092
- Correia, I., & Vala, J. (2003). When will a victim be secondarily victimized? The effect of observer's belief in a just world, victim's innocence and persistence of suffering.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6, 379 – 400.
- Furnham, A. (200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5), 795–817.
- Gaucher, D., Hafer, C. L., Kay, A. C., & Davidenko, N. (2010). 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everyday undeserved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 109–118.
- Hafer, C. L., & Correy, B. L. (1999). Mediator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negative outcom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2(3), 189–204.

- Hafer, C. L., & Olson, J. M. (1998).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sponses to personal misfortune. In L. Montada & M. J. Lerner(Eds.), *Responses to victimizations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p. 65 – 86). New York:Plenum Press.
- Hagedoorn, M., Buunk, B. P., & Van de Vliert, E. (2002). Do just world believers process unfair authoritative decisions differently?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1, 126 – 145.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T.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pp. 1122-1165). Hoboken, NJ, US: John Wiley & Sons.
- Lerner, M. J. (1965).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as a function of performer's reward and attract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4), 355.
- Lerner, M.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Plenum Press New York.
- Torres-Harding, S. R., Steele, C., Schulz, E., Taha, F., & Pico, C. (2014). Student percep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justice activities.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 9(1), 55-66.
- Zhang, Y. (2009).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Master's degree thesis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张媛. (2009). 中国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结构与测量.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意见 5：第一篇文章第三个研究“无论高阶层还是低阶层者，在处于对自己有利的环境中，其目标追求的动机水平都高”，这个说法好像不成立吧？因为高阶层者在三个实验条件下都没有显著差别阿？难道说所有的条件都是对高阶层者有利的？这句话在后面的总讨论中居然还重复了一次。

回应：因第一篇文章被拒稿，这里不再予以回应。

意见 6：第二篇文章的研究二，对被试本身的智商或英文成绩应该加以控制。从你提供的单词列表来看，这些词对于中学生太简单了，不知道有没有做过前测？

回应：第二篇文章的研究二，以及第三篇文章的研究二的设计方法依据的是 Vansteenkiste, Simons, Lens, Sheldon 和 Deci （2004）以及 Vansteenkiste, Simons, Lens, Soenens 和 Matos （2005）的设计。

首先被试为初中一年级学生，时间为上学期开学初，目标任务中词汇由所选取的 4 所中学内两位具有 5 年以上教龄的初中英语教师提供，是需要学生在新学期里重点掌握，需要学生根据中文写出对应英文词汇，音标及并造出一个句子。并且，这些词汇都是没有教学过的。即在研究程序上尽可能确保目标任务对所有被试来说具有相同的难度。重要的是，我们所选取的是平行班学生。本研究中所选取的 4 所中学，对学生进行分班的时候依据的是学生小学升初中的成绩，将成绩相近原则进行分班，那些成绩特别突出的学生分到重点班，其余的则分到平行班。因此本研究通过具体研究程序对被试本身的智商或英文成绩予以了控制。[见 3.1.2 第五自然段蓝色标识部分]

参考文献：

- Vansteenkiste, M., Simons, J., Lens, W., Sheldon, K. M., & Deci, E. L. (2004). Motivating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persistence: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intrinsic goal contents and autonomy-supportive contex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2), 246-270.
- Vansteenkiste, M., Simons, J., Lens, W., Soenens, B., & Matos, L. (2005). Examining the motivational impact of intrinsic versus extrinsic goal framing and autonomy-supportive versus internally controlling communication style on early adolesc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Child development*, 76(2), 483-501.

意见 7：每个实验后面的小讨论要聚焦在研究发现上。对方法的探讨应该放到前面的介绍中。

回应：已遵照专家意见修改。修改部分详见文章蓝色标示文字。[见 2.3 第一、二自然段；见 3.3 第二自然段；见 4.1.2 第三自然段；见 4.3 第一自然段蓝色标识部分]

意见 8：第二篇文章，研究三的逻辑是很奇怪的。目标承诺是“我郑重承诺会追求学习目标”，目标达成的标准却是第三阶段的成绩。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在分析第三阶段的成绩时，应该控制被试前两个

阶段的成绩。当然，这相对来讲是小问题。结果只是分析了少得不公平和公平，多得不公平组的情况是怎样的？

回应：（1）目标承诺是“我郑重承诺会追求学习目标”，目标达成的标准却是第三阶段的成绩。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这里，专家针对的实验中目标承诺和目标达成的具体测量问题。我们进一步澄清如下：所有被试完成第二阶段任务，并获得相应报酬后，被试完成对第三阶段任务的目标承诺水平的测量。告知被试，本实验第三阶段的目标任务是：请在 15 分钟内完成 10 道图形逻辑推理题目。对于这一目标任务，请根据自己真实感受：（1）我很难认真看待该目标；（2）坦白地讲，我并不在乎是否实现该目标；（3）我郑重承诺会追求该目标；（4）放弃该目标并没有多大损失；（5）我认为该目标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应该争取实现；（6）目前，我在该目标上努力的程度极强；（7）预计接下来十五分钟内，我会持续追求该目标。所有被试在七点量表上进行评定（1 完全不同意至 7 完全同意）。对此，可以看出本研究的目标承诺是针对的实验第三阶段的任务进行承诺的，而目标达成因此也是实验第三阶段的任务成绩。[见 4.1.2 第 5 自然段]

（2）在分析第三阶段的成绩时，应该控制被试前两个阶段的成绩。

第一阶段的成绩是没有进行公平感或不公平感操纵前的成绩，第二阶段的成绩是被试在受到公平感或不公平感操纵后的成绩，第三阶段的成绩则是连续受到两次不公平感或公平感操纵后，被试对实验任务的成绩。本研究的因变量目标达成是实验第三阶段的任务成绩，之所以要控制第一阶段任务成绩，是因为第一阶段成绩没有进行公平感或不公平感操纵前的成绩，在控制了公平操纵前成绩后，两组被试在第三阶段成绩的显著差异就只能归因于是实验操纵的作用。[见 4.1.2 第 6 自然段]

（3）结果只是分析了少得不公平和公平，多得不公平组的情况是怎样的？

在第一篇研究三，在少得不公的情境中，主观低阶层的目标承诺分数要显著低于主观高阶层的（ $F_{(1,101)}=9.85, p<.002$ ）；在公平情境中，主观低阶层的目标承诺分数与主观高阶层的目标承诺分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F_{(1,101)}=.52, p>.05$ ）；在多得得不公平的情境中，高低阶层者的目标承诺分数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F_{(1,101)}=.35, p>.05$ ）。本研究将不公平的环境进行了细分，划分为多的不公和少得不公两种不同的情境。发现低阶层者的多得得不公平情境下目标承诺水平最高，显著高于公平和少得不公平情境，而高阶层者在三种公平情境中，目标承诺分数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创新性发现。但由于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低阶层者多得得不公平的情境通常是不存在的或较少发生，因此，在随后的现场实验和针对真实生活情境展开的问卷调查研究中，均不予考虑多的不公的社会情境。[见 4.1.1 蓝色标识部分]

意见 9：前两篇文章都在讲社会阶层影响目标承诺，从而影响目标达成，到了第三篇文章，所进行的干预不是提高低阶层个体的目标承诺，而是用执行意向来提高他们的目标承诺和目标达成之间的关系！这个逻辑，我觉得有些费解。不知道作者的解释是什么？并且，执行意向能提高目标意向和目标达成之间的关系，这个已经被大量的研究证明了，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新意。

回应：因第三篇已被拒稿，这里不再予以回复。

意见 10: 与前面一位审稿人一样, 对于用“每天辅导孩子做 15 分钟作业”这样一件微小的事情作为一个教育目标, 我也不太喜欢。为什么不用更宏大一点或更个性化一些的目标呢? 当然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

回应: 在目标动机研究与目标追求研究的领域中, 将纸笔测验(例如, “在 15 分钟内完成 10 道图形逻辑推理题目”等)作为目标任务是非常常见的(Bayer & Gollwitzer, 2007; Gawrilow, Gollwitzer, & Oettingen, 2011; Pietsch, Walker, & Chapman, 2003)。在公平研究领域, 通过分配不同的报酬给参与相同纸笔测验任务的被试来考察公平感的研究也不鲜见。例如 1983 年, Messé L. A. 和 Watts, B. L. 发表在 JPSP 上的文章就是要求被试要完成连续 5 个阶段的纸笔测验任务, 每一个阶段持续时间为 25 分钟, 每一个阶段结束后都会获得一定报酬(一部分被试是 0.5 美元, 另一部分被试是 1.75 美元), 发现社会比较确实显著影响了公平感。

那么, 公平感是否会影响后续的纸笔测验任务中的成绩? 组织行为学领域中展开的关于组织公平的相关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初步的证据。在组织行为学领域中一些研究表明公平和目标达成之间显著正相关(Brockner et al., 1995; Lind et al., 1990; Earley & Lind 1987), 公平理论提供了关于公平对目标达成影响的具体假设和实证研究证据(Adams, 1965; Austin & Walster, 1974), 例如当员工知觉到分配不公时候, 他就会改变目标达成情况来恢复公平。程序公平模型并没有具体的关于公平与目标达成关系的假设, 而是关注于程序公平对态度和目标达成质量的影响上(Lind & Tyler, 1988)。因此, 本研究建立在 Messé 和 Watts (1983) 基础上, 通过纸笔测验来设置一个目标任务, 并通过分配实验报酬来操纵公平感, 以此考察其对后续纸笔测验任务的动机和成绩的影响。

研究现实意义问题。纸笔测验的实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而要使得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就需要扩大研究的外部效度, 而本研究进行的是系列研究, 其目的正是在确保研究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 具有很现实意义的基础上, 逐步提高研究内部效度。

参考文献:

- Adams, 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267-299.
- Austin, W., & Walster, E. (1974). Reactions to confirmations and disconfirmations of expectancies of equity and inequ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2), 208-216.
- Armor, D. A., & Taylor, S. E. (2003). The effects of mindset on behavior: Self-regulation in deliberative and implemental frames of min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1), 86-95.
- Bargh, J. A., Gollwitzer, P. M., & Oettingen, G. (2010). Motivation. In S.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 pp. 268-316). New York: Wiley.
- Bayer, U. C., & Gollwitzer, P. M. (2007). Boosting scholastic test scores by willpower: The role of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Self and Identity*, 6(1), 1-19.
- Brandstätter, V., & Frank, E. (2002). Effects of deliberative and implemental mindsets on persistence in goal-directed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10), 1366-1378.
- Brockner, J., Wiesenfeld, B. M., & Martin, C. L. (1995). Decision Fram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urvivors' Reactions to Job Layoff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3(1), 59-68.
- Earley, P. C., & Lind, E. A. (1987). Procedural justice and participation in task selection: The role of control in mediating justice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6), 1148-1160.
- Fujita, K., Gollwitzer, P. M., & Oettingen, G. (2007). Mindsets and pre-conscious open-mindedness to incidental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1), 48-61.
- Gawrilow, C., Gollwitzer, P. M., & Oettingen, G. (2011). If-then plans benefit executive functions in children with ADHD.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0(6), 616-646.
- Gollwitzer, P. M. (1990). Action phases and mind-sets.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Found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 2, 53-92.
- Gollwitzer, P. M., & Sheeran, P. (2006).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and goal achievement: A meta-analysis of effects and processe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 69-119.
- Grossmann, I., & Varnum, M. E. (2011). Social class, culture, and cogni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1), 81-89.

- Heckhausen, H., & Gollwitzer, P. M. (1987). Thought contents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motivational versus volitional states of mind.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1(2), 101-120.
- Johnson, W., & Krueger, R. F. (2005). Higher perceived life control decreases genetic variance in physical health: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twin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1), 165-173.
- Johnson, S. E., Richeson, J. A., & Finkel, E. J. (2011). Middle class and marginal? Socioeconomic status, stigma, and self-regulation at an elite univers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5), 838-852.
- Kraus, M. W., Côté, S., & Keltner, D.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1), 1716-1723.
-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09). 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6), 992-1004.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Review]. *Psychol Rev*, 119(3), 546-572.
- Lachman, M. E., & Weaver, S. L. (1998). The sense of control as a moderator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3), 763-773.
- Little, B. R. (1999). *Personal projects and social ecology: Themes and vari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pp. 501-524). New York, NY, US: Guilford Press.
- Lind, E. A., Kanfer, R., & Earley, P. C. (1990). Voice, control, and procedural justice: Instrumental and noninstrumental concerns in fairness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5), 952-959.
- Mahalingam, R. (2003). Essentialism, culture, and power: Representations of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9(4), 733-749.
- Mahalingam, R. (2007). Essentialism, powe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categories: A folk sociology perspective. *Human Development*, 50(6), 300-319.
- Messé, L. A., & Watts, B. L. (1983). Complex nature of the sense of fairness: Internal standards and social comparison as bases for reward eval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1), 84-93.
- Pietsch, J., Walker, R., & Chapman, E. (2003).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lf-concept, self-efficacy, and performance in mathematics during secondary schoo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5(3), 589-603.
- Sheldon, K. M., Elliot, A. J., Ryan, R. M., Chirkov, V., Kim, Y., Wu, C., . . . Sun, Z. (2004). Self-concorda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four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5(2), 209-223.
- Sheeran, P. (2002). Intention—behavior relation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2(1), 1-36.
- Snibbe, A. C., & Markus, H. R. (2005).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gency, and cho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4), 703-720.
- Stephens, N. M., Fryberg, S. A., & Markus, H. R. (2011). When Choice Does Not Equal Freedom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gency in Working-Class American Contex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1), 33-41.
- 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Townsend, S. S. (2007). Choice as an act of meaning: The case of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5), 814-830.
- Tucker-Drob, E. M., Rhemtulla, M., Harden, K. P., Turkheimer, E., & Fask, D. (2011). Emergence of a gene \times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raction on infant mental ability between 10 months and 2 yea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1), 125-133.
- Webb, T. L., & Sheeran, P. (2006). Does chang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engender behavior change? A meta-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2(2), 249-268.

意见 11：第三篇文章摘要,"其目标达成分数比不进行执行意向干预显著而较大地提高了目标达成分数",这是什么意思?

回应：发现在社会公平感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低阶层者目标承诺水平相对较低，与不进行执行意向干预相比，此时执行意向干预能显著但较小地提高目标达成分数；在社会公平感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低阶层者目标承诺分数更高，与不进行执行意向干预相比，此时予以执行意向干预，能显著而较大地提高目标达成分数。因第三篇文章已被拒稿，不再进行详细阐述。

意见 12：综合起来看，第一篇文章三个研究，两个实验都有问题，第二篇文章，第三个研究与前面两个不大相同。虽然第二个实验也有问题，但我觉得可取性比第一篇文章的实验二大一些。毕竟混淆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没有那么明显的关联（虽然关联也很大，你告诉家境较差的孩子不容易上好大学，不管别人的情况怎样，对他们都是打击不是吗？）第三篇文章亦有很大不足，加入执行意向，提高的是目标承诺和目标达成之间的关系（且这一关系已经被证明），还是无法弥补社会不公所带来的目标承诺

的低下。此外，作者在论文写作上，仍不够娴熟，尤其是引言和讨论（特别是讨论），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回应：已经针对引言和讨论进行修改。修改部分详见文章蓝色标示文字。[见 1.2；5 总讨论；5.1；5.2 第二自然段；5.3 第一、二自然段蓝色标识部分]

编委意见：

本系列三篇文章经过了三位专家的认真评审，一位专家意见为退稿，另外两位也提出了非常专业的批评意见。综合三位审稿人的意见，建议第二篇按照第三审稿人的意见重修修改后再发表。 其余两篇退稿。

第五轮

编委意见：

作者对第三轮的审稿意见进行了较好的回复，并对原文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但是文章仍有一些细节和错误需要修改，建议修改后发表。比如：摘要中研究 1、2、3 最好换成：研究一、研究二、研究三；此外，还有一个错别字：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通过正向影响低阶层者的目标承诺，进而正向影响起目标达成；应该是：进而正向影响其目标达成。文中还有类似笔误，请仔细阅读和修改。还有，研究一采用问卷法也不好，建议改成研究一为相关性研究。

回应：谢谢编委的细致指导。已遵照该意见对原文进行了详细修改，并用蓝色予以了标识。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原稿内容	修改稿内容	修改内容的位置
1	研究 1 采用问卷法	研究一为相关研究	摘要 L2
2	研究 2 采用准实验方法	研究二为准实验研究	摘要 L3
3	研究 3	研究三	摘要 L4
4	起	其	摘要 L6
5	不同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理论假设给出了初步的实证证据，	不同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理论假设予以了证实	1.4 L15-16
6	新学期的开学初，班主任老师以致家长一封信的方式，	新学期的开学初，由班主任老师以致家长一封信的方式，	2.1.2 第六自然段 L1
7	公组织平	组织公平	2.3 第二自然段 L5

8	图 4 社会阶层在社会公平感启动与目标承诺关系中的作用	图 4 社会阶层在社会公平感启动与目标达成关系中的作用	3.2.2 图 4
9	社会公平感对目标达成的影响是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社会公平感对目标达成的影响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3.2.3 第三自然段 L2-3
10	对此交互作用简单斜率检验	对此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	3.2.3 第四自然段 L1-2
11	研究 1 和研究 2	研究一和研究二	4 L13
12	绘制了社会公平感操纵与社会阶层交互作用	绘制了社会公平感操纵与社会阶层交互作用图	4.2.3 第三自然段 L2-3
13	通过 3 研究逐步推进	通过 3 个研究逐步推进	6 L1